



2020年·第5期·总期: 147 + S\$5.00



杏坛新雨
郭振羽学术随笔



作者简介

郭振羽，福建莆田人（今北京），早年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随后赴美在印第安纳大学取得新闻硕士学位，先是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73年回国任职，到美国加州，在加州大学（即改名后的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曾任社会学系主任及高级研究中心主任。1992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992—2002），担任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03—2005），负责筹办事宜。2008年回台大担任客座教授。2012—2016年应邀赴新加坡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兼任主任。现任新加坡新加坡科技与大学学术顾问。

羽音阵阵 余音袅袅的郭振羽

- 一个新加坡民间故事的海内外传播
- 山遥路远话裕廊
- “故事大王”陈兆锦的多角色故事
- 家国之殇：林谋盛四哥谋昌
- 他手上那支笔——林琼专访

「文化之旅」



带你重新探索新加坡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1年推出“文化之旅”活动，带领民众先后走访了多个文化历史地标和街区，让大家领略新加坡多姿多彩的多元种族与文化。

宗乡总会将“文化之旅”的游览线路整理成册出版，免费分发给公众。有兴趣的读者，可到宗乡总会会所领取“文化之旅”小册子，或者登录宗乡总会网站

<https://sfcca.sg/> 浏览电子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编辑语

文·谭瑞荣

不时会有国外机构通过信件或电邮咨询和购买《源》杂志，尤其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常会要求编辑部寄送整年的《源》杂志给他们。笔者在想：我们这本华文的“边缘杂志”，何以能得到处于“大中华区域中心”的中国诸多研究机构的器重？

无独有偶，“边缘杂志”遇到了“边缘人”！《羽音阵阵、余音袅袅的郭振羽》一文，郭教授就戏称自己为“边缘人”。他的“中心-边缘说”，让笔者受教，也深以为然。在“中心”的定位越来越宏观的今天，我们也在“边缘”反客为主，构建着自己有本土个性的“中心”。而我们的这本“边缘杂志”，也正有着相同的理念。

其实，无论您身处“边缘”亦或是“中心”，人类的文化都会随着历史的进程或互补或重构，因此，“在立足移居地的当下，边缘不再是边缘，而是具有华族文化特色但兼有本土个性的新中心。”郭教授如是说。《一个新加坡民间传说的海内外传播：以〈红山的传说〉为例》恰恰就印证了郭教授的某些观点。新加坡的舞台艺术家，正是立足于本土，以民间传说为蓝本，在打造本土特色的同时，也将这种特色带到海外，与其他文化碰撞出了灿烂的火花。《非凡的蜡染画家——杜亚》不也将印尼最本土的蜡染，结合西方绘画观念而重构了其绘画语汇吗？

艺术如此，语言亦然。《读词典 逛京城 品京味儿》就有这样的描述：“这几种语言集中在一个幅员724.4平方公里、人口564万的蕞尔城市岛国里，相互接触与碰撞，彼此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我们再来看科技：“各国科学家通过学报、研讨会在各领域里交换心得、互通有无、相互提携、促进科技发展。这才符合历史上有智慧、有人性的互助交流来加速科学进步的规律，若到头来却翻脸指责对方骗取、偷窃，那就有失信背约之嫌了。”笔者认为，《科技与人文关怀》中吴夫尔教授的观点，亦是科技文化历史发展大视角，站在了人类文化互补乃至重构的制高点。

无论因互补而形成的重构，抑或“中心-边缘说”，其实就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模式。这其中，既有被西方学者称为“隐喻”（Metaphor）的人类思维模式，也蕴含着东方哲学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元”观念和禅思，颇值得我们去深思和玩味。

2020年·第5期·总期：147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郭明忠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李叶明
委员：尹崇明 白毅柏 吴文昌
陈嘉琳 徐李颖 陈 煜

■ 总编辑 ■

谭瑞荣

■ 编辑 / 记者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李国樑

■ 总代理兼发行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Blk 8 Lorong Bakar Batu #06-12
Singapore 348743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设计、分色、承印 ■

Chromatic Media Pte Ltd
Blk 8 Lorong Bakar Batu #06-12
Singapore 348743
Tel : (65)6296 7228
Fax : (65)6296 7585
Email : chromatic@singnet.com.sg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9/02/2020

■ 出版 ■

2020年10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会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目录

- p.4 百年树人 羽音阵阵 余音袅袅的郭振羽 顾楠楠
- p.8 吾乡吾厝 家国之殇：林谋盛四哥谋昌 陈煜
- p.12 先贤后裔 印度情缘 吴明珠
—— 侧写甘地的华裔弟子曾圣提及其后裔
- p.15 旧貌新颜 山遥路远话裕廊 李国樑
- p.20 从新出发 屏幕后的一学期 郭亭利
- p.22 星洲回眸 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 刘家明
- p.26 戏如人生 “故事大王”陈兆锦的多角色故事 沈芯蕊
- p.31 狮城艺事 一个新加坡民间故事的海内外传播：
以《红山的传说》为例 蔡曙鹏





p.26 戏如人生



p.42 建筑情缘



p.46 文坛掠影

- p.36** 杏坛岁月 “柠檬”的秘密 尤今
- p.38** 社会经纬 科技与人文关怀 张夏韩
——谈爱上中华文化的李约瑟
- p.42** 建筑情缘 独一无二老巴刹 虎威
- p.44** 医药保健 经前紧张综合症的调理 李日琳
- p.46** 文坛掠影 他手上那支笔 齐亚蓉
——林琼专访
- p.50** 艺术长廊 非凡的蜡染画家——杜亚 赵宏
- p.52** 华语华文 读词典 逛京城 品京味儿 汪惠迪
- p.54** 仿佛风 葬 俞盈
- p.58** 本土文学 一片冰心在玉壶 陈芷婷
- p.62** 最爱书房 以《双城恋》解读孙宽 怀鹰



文·顾楠楠
图·沈文侃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郭振羽教授自1973年举家定居新加坡，如今已经整整47年了，在这个南洋岛国，郭教授经历了“壮年听雨客舟中”的厚积薄发，如今置身杏坛，虽然“鬓已星星也”，却桃李天下，硕果累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南国

杏坛听雨，有回音，有回响，仔细聆听，或许还有羽音阵阵、余音袅袅。”而10月出版的《杏坛听雨：郭振羽学术随笔》，正是郭教授近半个世纪来呕心沥血、辛勤耕耘最好的诠释与证明。

专注教学研究 硕果累累

郭振羽教授自1970年代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当时名为新加坡大学，“新大”）后，经历了短暂的适应期，而后快速投入到教学与学术研究中。郭教授的华人身份及根深蒂固的东方背景使得他能够更好地投入到新加坡社会研究中。新加坡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学术研究领域也有类似的问题，社会基本资料严重匮乏。即便如此，郭教

郭振羽

羽音阵阵 余音袅袅的

Singapore, 收集论文12篇, 郭教授署名三篇); 1980年又和阿芬德拉斯 (Evangelos Afendras) 合编《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Language and Society in Singapore, 收集论文11篇, 郭教授署名三篇)。这些著作是郭振羽教授对新加坡社会多年观察与思考的结晶, 奠定了他在社会研究领域的基础, 堪称为第一代新加坡社会学者。

多年后, 郭教授回忆初来新加坡的教学与研究生活, 依然充满了怀念, 苦中作乐或许是对那段时光最好的诠释。近20年努力教学研究, 见证了新加坡大专教育初步“去殖民化”的努力和成效, 成绩斐然, 也为郭振羽教授日后的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转型学术管理 桃李满天下

《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先生曾经评价郭振羽教授为“创业型学者”, 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郭教授的卓越成就: 1990年创办新加坡国立大学大众传播系(任创系主任1990-1995), 1992年受邀创办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任创院院长1992-2003),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创院署理院长2003-2005)以及创办《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创刊主编, 1990-2010)和2008年加盟新跃大学,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首任主任2012-2016)。可以说郭振羽教授是新加坡传播教育的开荒者及奠基人, 特别是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 几乎是郭教授从零开始打造出来的新学院, 一举成名,

授仍然和同事们排除万难, 想方设法获得资料, 深入探讨社会快速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边教学边研究, 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郭教授当时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领域: 家庭社会学和语言社会学。经过多年努力, 郭教授与简丽中 (Aline Wong) 1979年合编出版《当代新加坡家庭》(The Contemporary Family In



崛起为亚太区首屈一指的传播教育与研究院。五个创系、创院、创刊及创学术中心的开拓工程，不仅在新加坡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是很罕见的。

回忆这20年的“创业经历”，郭教授感慨万千。上世纪90年代，经过近20年的积累，郭振羽教授在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声望，特别是在大中华地区，有多家世界知名学府看重了他的双文化背景，承诺了优厚的待遇，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新加坡，留在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他把这一次次的使命定位为“拓荒园丁”。“与单纯的学术研究不同的是，学术行政工作需要策划、执行，需要拓荒、播种、施肥，还要呵护树苗成长、开枝成荫，这些经历原不是个人学术生涯规划的一部分，有此特殊机遇，不是个人有何德何能，能无中生有，只是生逢其时，正好身处大环境转型之际，有机会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郭教授谦虚地说：“如果说有成绩的话，只能说这几十年，一直都尽心尽力尽职，努力把事情做好。一路行来，还算是风轻云淡，如今绿树成荫，要感谢多少人的帮

助、多少人的呵护加持，我不敢居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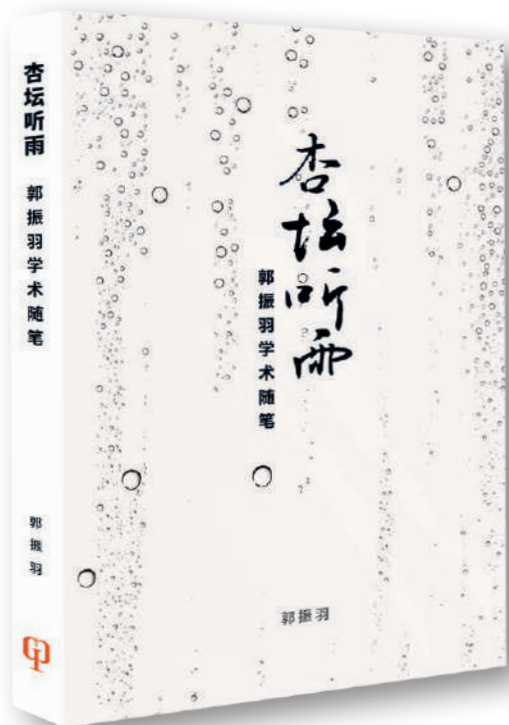
事实上，除了天时之外，郭振羽教授作为社会学者敏锐的观察力、传播学者强大的说服力和多年来独立思考、深入分析、准确判断的积累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每一次圆满完成使命后，郭教授都会全情投入到新的“荒田中”，“把机会留给年轻人，他们的成就就是我的成就”，这种甘愿做园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是多么令人钦佩呀！2010年郭振羽教授退休时获颁南大“终身荣誉教授”荣衔，实至名归。

沟通中西方文化桥梁 做个摆渡人

郭振羽教授在台湾的政治大学主修新闻传媒，到美国主修社会学，博士阶段偏重家庭和语言社会学，多年来关注跨文化、双语教育等课题。语言是文化的基础，郭教授本人的双语能力也非常强，美国教书多年，工作上完全使用英语，生活中或用英语或用华语，视场合对象而定。新加坡中西文化交互的特殊背景以及双语环境使他如鱼得水，成功游走于双文化之间，成为嫁接中西方的桥梁。

也正因此，郭振羽教授经常戏称自己为“边缘人”，他表示：“‘边缘人’并非负面涵义，人活在世，周遭会有很多圈子，总体来看我生活的大环境是在中西文化交互的新加坡，是在新加坡大的学术圈子里，我个人生活轨迹从台湾、美国，再到新加坡，我思考的课题兼跨传媒、文化、语言、社会，如此种种使得我常处在边缘位置，并以边缘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各种学术问题。”而也许正是因为“边缘人”的优势，使得他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海外华人文化认同问题，他认为：“应当从‘文化中华’的大视野看待新加坡的华族文化，重新解构‘中心-边缘’，‘中心’越来越开放多元，‘边缘’越来越呈现本土和自主特色。特别是海外华人，因为与家乡故国渐行渐远，终究选择认同本土；在立足移居地的当下，边缘不再是边缘，而是具有华族文化特色但兼有本土个性的新中心。只有具备这种多元、有容乃大的文化个性，才能培养出求同存异的文化事业，展现多元的文化中华。”

作为一名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和接受西方严谨而扎实的学术训练的双文化人才，在新加坡这块东西文明交汇的土地上，郭振羽教授始终



郭振羽教授新书《杏坛听雨》



2010年，南洋理工大学颁授郭振羽“终身荣誉教授”，左为贵宾陈振声部长，右为南大安博迪（Ber til Andersson）校长

以摆渡人的身份和“边缘人”的视角审视中西文化，成为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不忘初心回归原乡 杏坛听雨

“莫道桑榆晚，霞光尚满天”，郭振羽教授受邀担任新跃大学学术顾问（现为新跃社科大学），并于2012年创办“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提升大学华文相关项目和文化活动，加强和大中华文化圈以及新加坡华社的联系。郭教授坦言，“接受这个使命，我自觉终于可以‘任性’地回归文化原乡，更积极地参与本地华社讲座、讨论会。”

在朋友的鼓励下，郭振羽教授重拾母语写作，开始执笔记录这几十年的学术之旅，于是就有了这本《杏坛听雨：郭振羽学术随笔》，既是个人生涯的记录，也是时代的见证和一代人的共同回忆。辑一“杏坛听雨”、“初识新加坡”、“做个文化摆渡人”、“新加坡传播教育起步”，“从垦特岗到云南园”、“从播种到成荫”、“新世纪、新学院、新任务”记录了郭振羽教授近半个世纪教学、研究、管理的心路历程，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研究型学者、教育型专家、管理型人才的风采。“新闻、传播、媒体人”、“电视辩论外一章”记录了郭振羽教授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

份在学府与社区之间的游走，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公开讲座、电视论坛、报刊专栏中，主持专题座谈研讨、分析评判时局，发表社会问题观察研究等，普及大众文化传播，在本地教育界和文化界是首屈一指有影响力的人物。辑二、辑三和辑四“文化新加坡”、“华语和方言”、“儒家伦理运动”汇集了郭振羽教授多年来对“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文化中华的多元和开放”、“华语和方言问题”以及“儒家伦理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提出的“边缘人”、“城邦国家”，都是极富洞见性的权威解读，发人深思、引人深省。

我们是谁？身处在这个年轻的岛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郭教授在他的《杏坛听雨自序》中表示：“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我们都是从原乡而来，为建立新土，终于落地生根。这几百年的历程，简单而言是从落地归根到落地生根，从传统到现代。今日，我们立足新土，回望神州，放眼世界，当前立足处便是中心。展望前程，既已生根，更要努力耕耘，时时施加雨露，期待开花结果，开枝散叶。田园不芜，要靠每一代人的努力。”郭振羽教授正是用自己的一生在实现这个理想，大幕并未落下，华彩乐章仍在继续……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中国文学博士）

家国之殇：

林谋盛四哥谋昌



庄沅香、林谋昌（前坐者）与儿女合影（左一惠堂、左二惠明、中细玉、右二惠汀、右一惠贤）



文·陈煜
图·林谋昌后人提供

星

洲头家林路一生娶有6位夫人，育19个儿子9个女儿。他的前4位夫人均未能生育，领养10子2女，直到五夫人于1907年产下女儿碧霞，共为他生有7子6女，六夫人则生有2子1女。1909年4月出生的林谋盛是五夫人的第一个儿子，同年6月出生的林谋晋则是六夫人的第一个儿子，相差仅两个月的兄弟俩一同长大，在星洲同班就读于莱佛士书院，前

往香港大学读书，同时回返新加坡。

1944年林谋盛为抗日救国而牺牲，成为星马民众景仰的英雄，他的光芒照亮了林路家族，让人忽略了他的兄弟姐妹的成就。坊间多认为林谋盛作为林路第一个实子，以21岁的年纪担起家族重任，甚至传言林家养子不为林路所重视等。这些传言忽略了林路家族的实际问题——林谋盛出生时，林路年已58岁，在他年过半百的生涯里，养子肩负着家业重任，早已为家族服务。

由于年纪相差甚远，林谋盛与兄长犹如两代人，父亲林路长期居住在星洲，常驻家乡的兄长如父辈一般，对于林谋盛的成长有着重要影响，

其中包括比他年长24岁的四哥谋昌（家名：金顺，字：炯轩，1885-1950）。林谋昌的母亲为林路二夫人，育有长子金水、次子谋天、三子金泰（字：岳轩）、四子谋昌、七子金桔（字：瑞轩）。林路后裔留在中国的屈指可数，多为林谋昌后人，这与他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对于其生平的追述，有助于了解林路家族的变迁，以及在新闻两地的发展。

林路儿女间的情感

林路13子谋炎曾回忆，1925年他们一家约30口人，从厦门乘船抵达星洲，同行的除了他们兄弟姐妹，还有侄子侄女们。林路虽然是在星洲起家，在中国也拥有大量产业，除了在南安后埔老家建有祖厝和99间大厝，在厦门鼓浪屿建有林公馆，在厦门也投资实业，包括漳厦铁路等。

尽管一生勤劳，庞大的产业并非林路独力管理，一些有能力的儿孙担负起重任。1929年9月《南洋商报》刊发“福安有限公司启事”，宣布林路家族产业公司化管理，董事主席为林汉河，董事包括林金桔、林金恩、林玉柳，林金桔担任经理部总理，兼任福山砖厂司理，林金恩为经理部司理，林玉柳为福安饼干厂司理。其中林金桔为林路7子，金恩为9子，玉柳为孙辈。1934年

《南洋商报》亦称林金恩、林谋昌为“福安有限公司董事及经理”。

业已成年的儿子参与家族企业管理，1929年12月林路78岁高龄去世时，并未给年幼的子女带来冲击，彼时他最小的女儿清霞仅3岁，最小的儿子七四才4岁。林路17子大琛曾回忆，即便1930年其亲生母亲过世，11岁的他和弟妹们并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家族成员关系融洽，他们由各自的女佣照料。

二战之前星洲的华文报纸，多称“林炯轩谋盛昆仲”为闽侨闻人，有关林路家族的新闻报道，通常是林岳轩、炯轩与谋盛三位兄弟联合代表。岳轩与炯轩是当时林路家族第二代最年长者，1931年1月林谋盛与颜珠娘结婚时，《南洋商报》刊登有“林岳轩、炯轩先生令弟谋盛君与颜珠娘女士结婚志喜”的贺讯，两人作为男方家长出现在林颜两人在九龙堂的婚礼照片中。

林炯轩先后娶有两位妻子，与原配庄沅香育有4子1女，长子惠汀、次子惠明（家名：玉明）、三子惠贤（家名：玉贤）、四女细玉、五子惠堂，继室潘福贞。林谋盛与惠明叔侄同龄，出生于南安后埔，两人关系亲近。1932年（或1933年），林惠明与白毓珍结婚，林炯轩与谋盛代表男方家长出席他们在九龙堂的婚礼。



林惠明与白毓珍在新加坡九龙堂婚礼照片（后排左一林谋盛、左二林谋昌）

在华家族产业管理

林路家族成员间多以福建话沟通，儿女均接受良好的教育，由于出生地点和年代不同，他们对于华语和英语的掌握各不相同，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出生于福建，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成年后才到星洲，有些曾接受英文补习，以华语为主要语言，如金泰、谋昌等；第二类是出生于福建，在中国接受传统和西式教育，到星洲后继续英文教育，华英双语俱佳，如谋盛、谋晋和谋炎等；第三类是出生于星洲，虽家中聘请专人教导华文，但在英校读书，以英语为主要语言，例如再生、大琛、七四等。

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林谋昌是林路家族在华产业的重要管理人。1903年7月林路在厦门鼓浪屿从英国人手中购置大片地产，1913年，他将部分土地转卖给他人，次年在保留的土地上兴建两层高的南楼，1917年兴建三层高的北楼。林谋盛及家人从南安后埔搬到厦门时，均居住在鼓浪屿林公馆，在英华书院就读，为他们的双语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林谋昌往来星洲厦门，长期居住在鼓浪屿林公馆，1940年4月，他向厦门特别市财政局为该处土地及房屋申请契证，这与星洲方面对他行踪的报道相吻合。1946年8月21日《南洋商报》曾对林谋昌二战期间的经历做过详尽描述，称：“已故陆军少将林谋盛烈士乃兄林炯轩近由厦返星，氏于民国而是八年回厦养病……”报道称他在厦门积极领导敌后抗日，1946年返回星洲与家人团聚，并整理福安公司业务。

留守厦门后埔后裔

1940年林谋昌返回厦门时，同行的还有长媳戴秀英及其5子2女，次媳白毓珍及其2子2女，他似乎感受到战争的威胁，将孙辈全部带到鼓浪屿避难。在中国银行任职的长子惠汀，与在福安饼干厂工作的次子惠明则留在新加坡，1942年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惠汀在被抓捕后失踪，惠明侥幸生还。

二战之后，林谋昌与次媳白毓珍一家回到新加坡，继室潘福贞与长媳戴秀英一家则留在鼓浪屿，1950年初戴秀英带着幼子回到新加坡，任



1941年代戴秀英与儿女在厦门合影



1940年代白毓珍与儿女在厦门合影



二战后林谋昌与次子惠明一家在新加坡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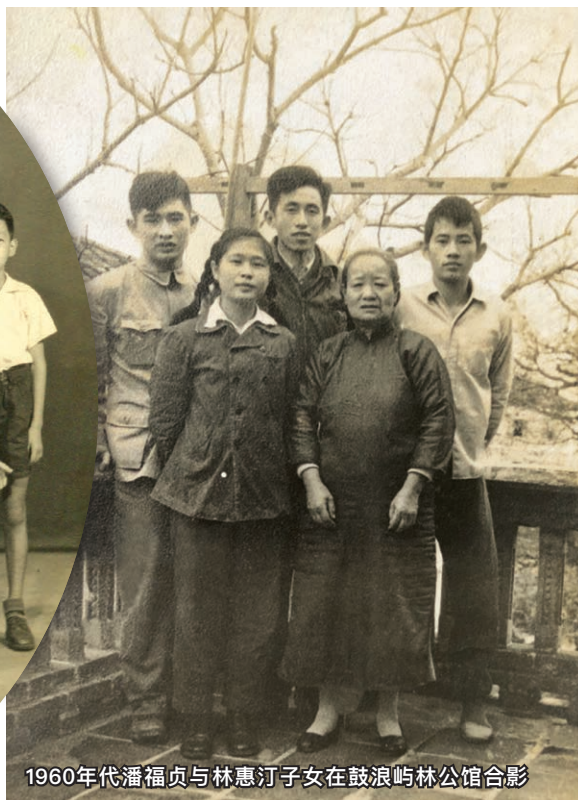
教于
中华女
中，将钱
款汇回厦门，
由潘福贞抚养其
子女成人。林公馆后
被征用，潘福贞等人被迫迁出。

林炯轩三子惠贤相信是在二战之前回到厦门，与洪宝英成婚之后，返回后埔老家看守祖业，育有2子2女，于1961年3月早逝。潘福贞年迈之后亦到后埔与惠贤一家同住，1974年2月逝世，家人将这位五代大母的葬礼照片寄到新加坡。

1949年之后，林路在中国的产业大多被没收，留守的家族成员处境艰难，林惠贤身患重疾困于轮椅，洪宝英带着儿女以务农为生。经历二战的国之殇，1950年4月林炯轩在星洲逝世，归葬于咖啡山，他与夫人庄沅香的神主牌由次子惠明、三子惠贤供奉于九龙堂。

2018年7月，惠贤之女瑞云来到新加坡，参加九龙堂林路与夫人神主牌安放仪式，随后前往咖啡山祭拜祖父，当她看到墓碑上孙女一栏中自己的名字，潸然泪下——远在星洲的祖父知道于1949年出生的她。

(作者为ON-LABO创办人兼主持人、本刊编委)



1960年代潘福贞与林惠汀子女在鼓浪屿林公馆合影



1950年代林惠贤、洪宝英夫妻与长子祖泽，次女瑞云



咖啡山林炯轩墓地 (本文作者摄于2018年)



印度情缘

侧写甘地的华裔弟子曾圣提及其后裔



文·吴明珠

图·受访者提供

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在谢福崧的陪伴之下到荷兰路一间三层楼的洋房。洋房的主人是谢金玲，她和她的儿子周伟立一起住。去那里的目的是搜集资料以便写一篇有关曾圣提的文章。曾圣提是上世纪出现在新加坡的一个非凡人物，谢金玲和谢福崧都是曾圣提四妹的孩子。

我一踏进客厅，目光便给挂在墙上的一幅肖像吸引住了。肖像里的人物是曾汉经，晚清秀才——曾圣提的父亲。

创办报刊与创作文学

曾圣提被称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导航者。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凤凰镇，原名曼尼。小时候在私塾念书，后来在厦门集美学校接受中学教育。1922年南来新加坡，在道南学校任教员半年后回上海。他受泰戈尔的感召，1925年赴印度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求学。在印度期间，经友人的介绍，他成了圣雄甘地唯一的中国学生。圣提（shanti）这个名字就是甘地为他起的，是梵文“和平”的意思。曾圣提1926年回国，翌年再度来新，定居新加坡以后陆续安排弟妹南来。他有弟妹12人，6弟6妹，原配名陈可美，两人育有三男三女。在本地，他参与多家华文报刊的创办工作，如《南洋商报》、《电讯新闻》、《现代日报》等。他在南洋商报担任电讯翻译与副刊编辑期间，和他的弟弟华丁、玉羊及朋友积极提倡文艺。先后在该报创设《洪荒》、《文艺周

刊》等副刊。

曾圣提提出“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铁塔”的口号，在各报章杂志发表了48篇作品，其中诗20首、散文9篇、小说11篇、译作7篇、剧本1个。1937年“七七事件”发生后，他组织“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任团长并亲临台儿庄等战场采访，实地报道抗战情况。

1932年，曾圣提再访甘地。1936年去槟城与友人合创《现代日报》，直到日本南侵前才回到中国重庆。他有一个邻居，小伙名为程奇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居住天津时，与其来往甚密。程在一篇刊登在中国的文章中写到：“曾伯伯是一个快乐、宽容、淡泊名利的人，在我青少年时期，他是对我有很大影响的人。”

1943年2月，曾圣提听到甘地第6次绝食，用10天时间写成《在甘地先生左右》，记叙他在甘地身边的经历。这本书160页，1943年由上海真善美图书公司出版，1959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重印。杨松年教授在他的《新马早期作家研究》中称，这本书问世后，就被誉为1943年最佳著作。因为不论是内容或写作手法，它都与众不同，好评如潮。曾圣提和这本书曾是南洋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专题。

与甘地关系密切

甘地对曾圣提给予特别关注，让他成为自己最亲近的学生：可以与他的儿孙一起用餐。曾圣提在印度也施行绝食，在书中对绝食期间的记叙十

分详细：从身体痛苦、意识麻木到心中圆满、精神畅旺。

他第二次去印度探访甘地时，这样描写他抵达的那晚：“无意观赏月亮，但月亮偏那样撩人，没有叶的巨树的疏影，好像淡墨泼成的图画似的，洒在地上：浓的是干，淡的是枝。”又写在阿须蓝甘地与众门徒在广场上晚祷的场景：“晚饭后，夕阳在地平线上，我第一次发现印度西部夕照天空的美丽：远空近空的霞彩，由橙红变成强烈刺激的紫色，转瞬间，又变成鲜明愉快的桃花色……”

曾圣提自1949年后再未动过笔，1979年，印度“甘地和平基金会”邀请他去印度，在甘地的“隐庐”圣巴马提阿须兰从事甘地生平及思想之研究。临行前，中国有关方面终于承认了他的地位，授予他“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的职称。在这之前的30年，曾圣提静静地坐在天津兆丰路信厚里那栋三层小洋房里，无人理睬。曾圣提于1982年12月在阿须兰去世。

历史学家方修所编撰的十本《马华新文学大系》里，把曾圣提列为“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贡献的作家”。杨松年教授、林万菁教授以及其他学者都写过有关曾圣提的专题文章。

《在甘地先生左右》最后一章“别离”中他写道：“临晚，一点月色也没有，祷告在圣巴马提河畔黑魇魇的祷场中发出。巴布兹（印地语“父亲”）叫我坐在他的身旁，面向着村中大众，他向村民正式宣布我的离去，大家一齐为我祝福。火车抵圣巴马提车站的时候，我站起身来向巴布兹告别。我弯下身子，触他的足背，他沉重地拍我的肩背。我的眼泪忍不住又夺眶而出。”

周伟立，43岁，是继曾圣提以后他们家族唯一的写作人，毕业于牛津大学，现在帮助他母亲经营椰子产品的生意。他从高中开始便爱上写作，曾以陶宗旺为笔名出版了三本诗集，即《支吾》、《匿名的忧郁》及《中途爆胎》。

伟立说：“我大舅公给年轻人的启迪就是勇于追求梦想和有世界大同的胸襟。我作为他的后裔感到很光荣。”

谢福崧在1979年曾圣提从中国去印度，途经新加坡时见过他。他说：“那时舅舅78岁，说话声音洪亮，精神很好。他勇于追求梦想，上世纪20到40年代之间交通很不方便，他竟然敢乘



左起：诗人周伟立和谢福崧

船到印度去，真令人佩服！他给年轻人的教诲就是：要勇于追求理想，不要贪图安逸。”

曾圣提曾孙女再结印度缘

继曾圣提之后，上世纪80年代，他的后裔又再度与印度人结缘。其孙女曾也兰于1980年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一个静修的地方认识了谷达克兰提（Kranti Gutta），后来两人结婚，生下两个女儿。克兰提目前是印度银行业公会的秘书。大女儿贾瓦拉（Jwala Gutta）成为国际级的羽毛球健将。

贾瓦拉，37岁，身高1.78米，从90年代起便代表印度参加重要的混合双打及女子双打羽毛球赛。她一共打赢316场赛事，是赢奖最多的印度人。她曾于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荣获金牌；2011年在伦敦举办的奥运会夺得铜牌；2013年在国际羽毛球赛中夺得铜牌。贾瓦拉于2011年荣获亚朱那奖（Arjuna Award），是印度10大运动员之一。



左起：贾瓦拉、父亲、母亲和妹妹



贾瓦拉是印度10大运动员之一



贾瓦拉新创立的体育学校

贾瓦拉在瓦尔达 (Wardha) 出生，现居海得拉巴 (Hyderabad)，4岁开始勤练羽毛球。除了以球艺著称，贾瓦拉很敢发言。她公开争取妇女的地位，反对暴力。她说：“做人要有正义感。坏的事情，像强奸、对妇女和学生施暴都应该强烈谴责。”印度媒体问她是否爱国，她回答：“我从小就代表国家打球，再也没有人比我更爱国。”贾瓦拉刚在海得拉巴创立一间体育学校，训练各类运动员。她说：“我一直都想有自己的事业，我有领导能力，喜欢挑战。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我希望培养有个性的运动员，把他们带进体坛。”

今年九月，贾瓦拉刚和电影演员维诗努·维沙尔订婚。我们恭喜曾圣提的后裔都前程似锦、幸福美满！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Indian Encounters

Zeng Shengti was a unique man. Born in 1901 in Guangdong Province, he migrated to Singapore in 1922 but visited India three years later to study in Tagor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for a year. While there he met Mahatma Gandhi and became his only Chinese student. Gandhi named him “Shanti”, which means peace. He was very close to his master at his home at Sabarmati Ashram and was allowed to have meals with his family. Shengti fasted for 10 days in September 1926. When he returned to Singapore that year, he founded various Chinese newspapers and literary supplements with his brothers Yuyang and Huading. He worked for a while as editor of Nanyang Siang Pao’s literary supplementary pages and as translator for its international news section. He had published 20 poems, 9 essays, 11 novellas, 7 translated essays and a play. Shengti had six younger brothers and six sisters, He had three sons and two daughters.

In 1932 Shengti visited Gandhi again to stay with him for about two months. In 1943 when he heard about Gandhi’s 6th fasting session, he spent 10 days writing a book titled In Mr Ghandi’s Company. In the 160-page book he records his life with his master. Most of all he recalls the various stages of his fasting experience, ranging from pain, numbness to full energy. The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by a Shanghainese publisher and subsequently reprinted by Youth Book Company in Singapore in 1959. The book had been hailed as the best book in 1943 for its literary values. The man and the book had been a hot topic among Chinese researchers in the 1950s and 60s. In it he describes the beauty of the moon on his arrival at the Ashram at night on his second visit. In the last chapter on parting, he describes the solemn mass prayer session by the river on a moonless night.

In 1980s, the Zeng family regained their connections with the Indians. Shengti’s great grand-daughter Jwala Gutta was born to an Indian father and Chinese mother. Jwala trained in badminton since the age of four and became a world-class badminton player at mixed and women’s doubles. She won in 316 matches and was one of top ten Indian sports persons. She has also won numerous medals for India. She was given the Arjuna Award for badminton in 2011. Besides being a top badminton player, she is noted for being outspoken on social issues. She has openly condemned violence, especially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students. She considers herself the most patriotic sports person as she had been representing India since young. She has recently founded a sports academy in Hyderabad to train sports persons. She says she has always wanted to do something and believes she has leadership quality. She thinks everyone is unique and aims to bring out the individuality in each and every student and eventually take them onto the sports scene. She was engaged to Indian actor Vishnu Vishal in September.

山遥路远话

裕廊

裕廊湖与湖畔的裕华园，吸引早期的居民到裕廊安家落户



文图 · 李国樑

从 前和现在的裕廊是不同的区域概念，现在的裕廊有裕廊东、裕廊西以及裕廊工业区。1911年地图中的裕廊虽然占地不大，但居民眼中的裕廊是以裕廊路为准，裕廊路有多长，裕廊便有多大，差不多是武吉知马路上段以西的半壁江山。

裕廊有9万多个组屋单位，33万多组屋居民。很难想象上世纪60年代，本地的组屋单位必须抽签分配的时候，达曼裕廊（Taman Jurong）的单位竟然无人问津吧！

半个世纪前，为了提高裕廊的人气，裕廊湖畔出现由台湾建筑师设计的裕华园和日本园林大师设计的星和园。宋代风格的园林，人工中见自

然；室町庭院，自然中透禅意，仿古风貌相映成趣。至于坐在汽车里，星光下看露天电影的裕廊大影场，于上世纪80年代电影业低潮时结束业务，如今成为湖畔花园的一部分。

裕廊的词源可能出自马来文 Jerung（鲨鱼）或 Jurang（深渊），可见这里是依山傍海之地。19世纪中叶，土地测量师汤申沿着裕廊河深入内陆，发现这条大溪流的上游有两个分支，东部称为裕廊，西部称为秉江（Peng Kang）。如今，裕廊河和裕廊湖成为裕廊东（当年的裕廊）和裕廊西（当年的秉江）的分界。

秉江的由来可能跟马来语“Pengerangan”（烘干）有关。这个地方曾经是甘蜜园，将甘蜜叶置入大鼎煮成膏状，放到太阳下“烘干”后就是出口的皮革染料了。至于曾在新加坡武装部队训练学院（SAFTI）受训过的老兵，每当经过光秃秃的秉江山时多会被罚冲山，上下几趟后被“烘干”的感觉特别强烈。

裕廊的海人：御用海军还是合法海盗？

从前的裕廊是个山林地带，海上的小岛星罗棋布，被帆船时代的航海家形容为迷宫。如今有



消失的裕廊大影场：停车场的地面呈波浪状，使停放的车子有个斜度向上看。（图片来源：互联网）

些小岛已经跟本土连接起来。比如裕廊造船厂建在施穆仑岛（Pulau Samulun），裕廊海港的所在地原为丹绒巴莱（Tanjong Balai），裕廊岛则由多个离岸岛屿合并成石油化工中心。

施穆仑岛的名字源自裕廊的海人（Sembulun），专向路过的商船征收过路费，殖民地政府称他们为海盗。一些研究员认为这些海人原为苏丹的海军或税务官，跟抢劫商船的海盗身份不同。英国的自由港政策跟马来苏丹历年来征收关税的做法出现利益冲突，海军袭击商船其实是报复行动。

实里达人（Orang Seletar）的后裔Eddie Salim表示，裕廊的海人其实是实里达人，目前在柔佛南部濒海而居。裕廊工业区开发的年代，承包商聘请他们清除红树林，完工后以周转不灵为由便走人了。他们有冤无路诉，最终不了了之。

裕廊工业区的发展

裕廊造船厂是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株式会社的投资项目，于1964年投入生产。船厂建在跟新加坡本岛相隔一公里的施穆仑岛，员工必须将油桶组装成渡海工具，连食用水都是从本岛运载过去的。

新加坡政府成立的SIS糖厂是另一家最早入驻裕廊的企业。SIS堪称“新加坡糖王”，除了在东南亚占据一席之地，于中东地区名气也响当当。糖厂私有化后，两年前由日本财团全面收购。



裕廊山上别有洞天，除了瞭望塔外，还有各国政要植下的多棵“贵宾树”

将山林园丘发展为工业区并非全新的概念。裕廊本来已经有砖厂、龙窑和罐头厂，有一些工业基础。山丘泥土正好用来填平沼泽地，由于多数农民居住在公家的土地上，搬迁赔偿事宜也较容易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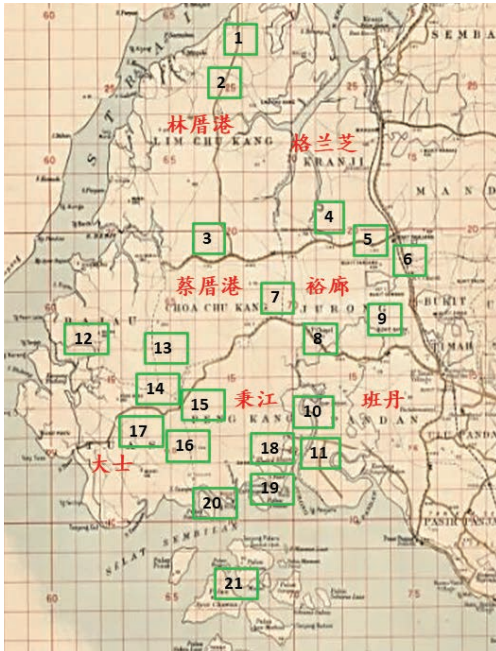
吴庆瑞出任新加坡自治邦财政部长时，认为新加坡海港贸易和相关的金融保险业扩张潜能有限，唯有制造业才能提供更多商机。由荷兰经济师温士苗斯（Albert Winsemius）领导，日本专家为主干的联合国调查团（1960年）提呈新加坡制造业发展蓝图。吴庆瑞落实多项建议，包括成立由韩瑞生领军的经济发展局（1961年），成功争取到多元化的新兴工业投资，如大众钢铁厂、纺织、线香、肥料和咸蛋工厂等。

无法实行的“收费闸门”

在那个跨国公司都被视为吸血鬼的年代，吴庆瑞更重视“抢蛋糕”，蛋糕到手后再看如何



裕廊山上眺望裕廊岛（左半幅）与施穆仑岛上的裕廊造船厂（右半幅）



根据 Map of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and its Dependencies 1911 (Creator: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制图)

1. 林厝港路20英里
2. Namazie Estate 南亚利橡胶园林厝港路19英里
3. Choa Chu Kang Cemetery 蔡厝港坟场
4. Bulim Village 武林山
5. Choa Chu Kang Road 蔡厝港路
6. Upper Bukit Timah Road 武吉知马路上段
7. Jurong Secondary School 初建的裕廊中学
8. Jurong Road 裕廊路
9. Lam San Village 南山
10. Jurong Lake, Jurong River 裕廊湖, 裕廊河
11. Toh Guan Village 卓源村
12. Poyan Village 博杨村, 博杨打靶场
13. Nanyang University, Yunnan Garden 南洋大学, 云南园
14. SAFTI, Chengdu Garden 新加坡武装部队训练学院, 成都园
15. Boon Lay Village 文礼村
16. Lok Yang Village 洛阳村
17. Zhejiang Garden 浙江园
18. Taman Jurong 达曼裕廊
19. Tanjong Balai 101 特别训练学校, 现在的裕廊海港, 裕廊渔港
20. Pulau Samulun 施穆仑岛, 裕廊造船厂
21. Jurong Island 裕廊岛 (12个小岛组成)

分配。为了吸引外资，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为新工厂主持开幕，刻意制造新闻。

吸引国人到“遥远”的工业区工作是件棘手的任务。建屋局在达曼裕廊兴建的两三千个组屋单位迟迟无人问津，原因是缺少基本设施。没理发店、咖啡店、百货公司，甚至连第一家金融公司都是美国银行。1968年大华银行才开设分行，1972年政府才在永升路（Yung Sheng Road）建立俗称“六十摊”的小贩中心。

为了“强迫”工友搬到裕廊，吴庆瑞准备推出“收费闸门”，每个月向载送工友到裕廊的车辆收取“过路费”。工会觉得政府在威胁国人，经济发展局则担心影响投资情绪。多方商议后，雇主决定提供住屋津贴，政府建设更多公共设施，员工短缺的现象终于得到缓解。没实行的收

费闸门，则于日后用来控制繁忙路段的交通。

70年代中叶，裕廊发展为700多家工厂的成熟工业区，8万居民在达曼裕廊和随后兴建的文礼组屋落户。

重工业的工商意外多

上世纪70年代，我考完O水准最后一张试卷，大清早披星戴月，乘坐从车厂开出的第一趟巴士，到飞禽公园后面的留芳路台隆造纸厂上班。这是家合资企业，那时候新加坡与台湾正在建立双边贸易关系，台湾为新加坡提供军训场所，并响应新加坡的工业化政策投资设厂。

台隆造纸厂有两条生产线，以回收的废纸做原料，巨大的滚轴将搅碎去色的纸浆压成牛皮纸和卫生纸。机器时常发生卡机的状况，技工必须紧急处理，几乎每个月都发生一两起手指被压得血肉模糊的意外。那个年代，这类工商意外见怪不怪，我也曾经因伤到裕廊医院排队缝针。台隆将劳工保险赔偿金付给我，不像一些雇主悄悄地占为己有，让我窝心了好一阵子。

告别劳动生涯几个月后，裕廊造船厂发生油槽船爆炸，76人死亡，多人受伤。曾为裕廊一家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跟一些同学到中央医院探望不相识的工友，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炭焦和



药水味，侥幸生还的工友全身包扎着纱布绷带，向我们报以答谢的眼神。

经历此事件后，劳工部全面检讨工业安全机制。故有人戏说安全制度是“血染的风采”。

裕廊海港与丹绒巴莱

将裕廊河口的丹绒巴莱发展为裕廊海港是工业区的发展蓝图之一。这里是个天然深水区，大船可以停泊。丹绒巴莱这个消失的海角曾经扮演过多重角色。二战前，犹太人约瑟大卫（Joseph Brook David）在此地建立私人别墅，同时兴建林间小路 Jos David Road，招待的社会名流包括苏丹、王族和殖民地精英。日据时期约瑟大卫被日军扣留，和平后在前往中东疗养途中去世。

这个隐蔽之处也是英国人的101特别训练学校的所在地，受训的人士来自五湖四海，有各国的军人和平民，以及本地的华、英、巫族和欧亚人。他们的任务是匿藏在日军据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与谍报工作。受训后，有些人参与星华义勇军，其他人则组织136部队，进行一系列的谍报行动。二战结束后，丹绒巴莱发展为度假酒店，马来亚小姐选



新加坡的鱼产主要来自邻国，每天进口约200公吨的新鲜海产，其中约八成在裕廊渔港销售（图片来源：Darren Soh）

美赛在这里举行。对于选美这种“萎靡”的社会风气，当时还引起一阵文化激荡呢！

裕廊渔港

裕廊海港旁就是裕廊渔港了。晨昏颠倒的渔港有百多个小贩摊位，众人酣睡的时分，这里忙碌的喧嚣声打造着渔场人生。

凌晨时分，渔船在此停靠，通过渔港的批发市场分销给巴刹小贩、超市和餐饮业者。据新加坡鱼商总会的资料，新加坡的鱼产主要来自邻国，每天进口约200公吨的新鲜海产，其中约八成在裕廊渔港销售。

至于新加坡现有的百多家渔场，供应量约占市场一成，距离“农产品2030愿景”（2030年将供应比率提高到30%）还有漫漫长路。

洛阳村：感情深处都有一个家

19世纪中叶已有数百名华工在裕廊的种植园工作，福建先民是最大的族群，潮州人次之。他们开辟的村落也叫“山顶”，这些自己命名的地区有南山村、武林山、博扬村、大士村、浙江园、成都园、云南园、文礼村、洛阳村等。二战前“山顶”有六间安溪人创办的学校：孺廊、裕群、醒南、培德、辅华、洛阳，以及其他民办的裕华、光华、崇华、强华等乡村学校。新加坡自治邦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时，希望裕廊的工农支持政府的宏愿，让孩子上中学读书。1963年，裕廊中学开课，成为当地孩子们的首选。

60年代末，挖土机开往洛阳村边缘，居民接到搬迁令，最后一批于1972年左右搬迁。洛阳村居民黄金华女士细数从前，由于惹兰巴哈（Jalan Bahar）建路，父母搬到洛阳村落，没想到以为可以安居乐业的时候，又得收拾细软搬迁到林厝港尾了。

当时有些居民决定放弃农耕，搬到达曼裕廊，继续务农的则集体搬迁至林厝港19英里与20英里。19英里是被铲平的南亚利橡胶园（Namazie Estate），20英里则靠近林厝港路尽头。率先搬迁的洛阳学校的学生，分别在林厝港的几间乡村学校插班；无法插班的则起早摸黑，风尘仆仆地回到老远的洛阳学校上课。

发展裕廊的国家大事变成林厝港大家庭的烦忧，这正是发扬甘榜情的时候了。经过两年的努力，洛阳学校在林厝港的第一期新校舍落成，升中学的学生多数到“附近”的裕廊中学就读。黄金华每天走半小时到大路口，乘搭172号巴士到蔡厝港13英里，再步行半小时才到学校。每天花四个小时上学回家，就是农家女成长的征途。

80年代，林厝港人家接到搬迁令，多数迁往新落成的武吉班让组屋。从前一个村落就是一个社区，潜意识下，人人都有自愿付出的温情，当山不再遥，路不再远的时候，风土味也彻底改变了。

参考文献：

- [1] 黄金华口述历史，2020年5月5日。
- [2] 南洋商报、星洲日报、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
- [3] 新加坡鱼商总会，<http://www.fishmerchant.org.sg/about.htm> accessed 7 May 2020.
- [4] Eddie Salim, Jefree Salim, "Public Lecture Series: Orang Seleta An indigenous sea people of Singapore", Malay Heritage Centre 5 October 2019.
- [5] Jurong Heritage Trail,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April 2015.
- [6] KEY STATISTICS, HDB ANNUAL REPORT 2018/2019.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 [7] The Straits Times.
- [8] Toh Guan Nge, 洛阳：北迁南亚利，<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65763383605892/permalink/960020660846824/> accessed 7 June 2020.

(作者为英国皇家造船师学会会士、自由文史工作者)

Jurong, a land far far away

Jurong consists of Jurong East, Jurong West and Jurong Industrial Estate. In the "Map of the Island of Singapore and its Dependencies 1911" produced by the Great Britain War Office, Jurong only occupied a small segment roughly the size of today's Jurong East and Bukit Batok. However, to old Jurongers, Jurong was a big piece of land stretching along Jurong Road, from Upper Bukit Timah all the way to the west end of Singapore.

Jurong's etymology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Malay word Jerung (shark) or Jurang (gorge).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Government surveyor John Turnbull Thomson went inland along the Jurong River, describing two branches at the upstream with Jurong in the east and Peng Kang in the west. Today, Jurong River and Jurong Lake form the boundary of Jurong East (Jurong) and Jurong West (Peng Kang).

In 1960,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acquired land to construct Jurong new town. The project was spearheaded by Goh Keng Swee, Hon Sui Sen and Dr Albert Winsemius to convert the swampy mangrove forest into Singapore's first industrial district. The Jurong project was completed with standalone factories and heavy industry sectors in shipbuilding, steel milling, cement and textile manufacturing.

Taman Jurong is a residential precinct in Jurong West. It is one of the oldest HDB estates in Singapore which were originally built to encourage workers to stay near their workplaces. With today's more than 90,000 HDB units and 330,000 residents staying in Jurong, 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that those Taman Jurong flats were largely unwanted by the masses in the initial years.

With just factories and scarce facilities in Jurong in the early 1960s, workers were hesitant to relocate their families to these flats. Goh Keng Swee coined the idea of a gantry system charging \$50 a month for buses and lorries ferrying workers to Jurong. Eventually this idea was aborted as companies offered housing allowances for workers to reside in Jurong, and the government also expedited the building of public amenities and leisure parks. The 1970s brought about the unique attractions synonymous with Jurong today-the Jurong Hill, Jurong Bird Park, Science Centre,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s.

The indigenous people who stayed at this part of the island were the nomadic Orang Laut. For centuries, the Malay and Orang Laut sea captains were given authority as the naval forces of local Sultans to patrol the waters and impose taxes on commercial vessels. The British free trade policy clashed with the livelihood of Malay chiefs. The British often deemed such disputes as piracy although these patrollers were not the actual pirates.

In the early colonial era, some new settlers ventured into unknown regions including Jurong. Many of them were Hokkien and Teochew gambier and pepper plantation owners and workers. Gambier's legacy was apparent at Peng Kang probably derived from the Malay word "pengerangan", which means boiling and drying of gambier leaves.

Tanjong Balai was once a remote jungle near the mouth of Jurong River which was only accessible by sea. Just prior to the Japanese invasion during WW2, the British set up the 101 Special Training School (101 STS) at this hidden place. The school brought together civilians and military personnel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including local Chinese, Malays, Indians, Eurasians and allied forces. Upon graduation, they would conceal themselves in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and conduct guerrilla warfare and propaganda missions. Some 101 STS Chinese trainees joined Dalforce which also partook and fought in the Jurong battles. Others formed Force 136, which would carry out a series of daring intelligence and sabotage operations in Malaya.

Tanjong Balai soon immersed itself into the ambitious Jurong New Town project and developed into Jurong Port and Jurong Fishery port. The fishery port supplies 80% of Singapore's daily seafood consumption.

屏幕后的一学期



文图·郭亨利

2020赋予了“家里蹲大学”新的含义，但凡大学生都不免沦为该校的新生。离开北京、上海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转校”在即，洗衣篮里还躺着来不及洗的冬衣，冰箱里的垃圾食品保质期不超过一个月，文具、教材一样没带走，我们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在新加坡迎来了2019到2020学年的春季学期。

二月底，在校方和老师们的努力下，北大延迟返校、按时开学，同学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坐到了电脑屏幕前。根据我个人和身边几位同学的经历，北大的网络教学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视频、音频直播，视频、音频录播以及教学资料自主学习。每种形式的教学效果因为所使用的软件以及老师对软件的掌握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别。

在所有授课方式中，ClassIn在线教室直播的体验是最好的，懂得有效利用ClassIn功能的老师能够最大程度上接近线下授课的效果。ClassIn课堂界面上方是七个视频窗口，最左边的固定窗口是老师，其余六个是学生，老师可以通过系统设置让同学们轮换着出现在界面上。事实上，许多老师上网课时总有种对着墙壁自言自语的感觉，因此他们通常会要求同学们打开摄像头，增加互动，但大部分同学出于在家毫无形象、脸皮薄、不方便开小差等原因一致选择失聪，老师们也无可奈何。

七个视频窗口下方是一块巨大的“黑板”，既可以放幻灯片，又可以写写画画，空间安排完全由老师把控。上课过程中，同学们一旦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点击右下方的手掌举手，或是在右边工具栏的对话框里反映；下课后，经过设置的ClassIn课堂支持反复回放，播放速度也能进行调整，方便无法观看直播或是上课没听懂的同学自学。除了ClassIn外，腾讯会议和北大直播课堂也是老师们常用的直播平台，只是功能不

如ClassIn全面，不能计时、发起投票、随机抽取学生等等，好在操作上的简化对不熟悉电脑使用的老师来说更为友好。

录播是继直播之后最受欢迎的授课方式。录播的形式很多：有的老师在每一页幻灯片中插入自己的讲解音频；有的选择录屏；还有的搭配着课件录像等等。同学们需要在规定时间内下载老师所上传的文件进行学习，遇到问题可以发邮件或在课程微信群里提问。对老师来说，直播和录播需要付出的心血基本相当，但录播为部分脱稿困难的老师减轻了压力，提高了课程在学生中的口碑。比如我曾在线下上过一位老师的课，她讲课声情并茂、风趣幽默，只是视线总离不开手上的讲稿，和学生几乎没有眼神交流，大家私下戏称这是mp4转mp3。结果课程搬到网上后，这位老师受到一致好评，她录播的视频中没有丝毫读稿的痕迹，同时保留了所有其它优点，我不知道老师是怎么做到的，但这一定是一位认真、负责，对教学质量有要求的好老师。

最后一种教学形式，哦不，自学形式，是同学们最反感的。只要不是第一次开课，老师们手上总有之前准备好的教学材料，将资料一股脑扔给学生自学，偶尔答答疑，没有比这更省事的授课方式了。遇到这样的老师，不满的同学有义务向老师提出意见，有些老师收到反馈后会尽快调整教学方案，当然也有老师假作不知，但这毕竟是少数。如果我们一面诟病老师，一面又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师生双方都应该为学习的低效负责。

上了四个月的网课，我多次对比线上和线下教学的学习效果，试图思考网课对我们来说是祸是福。我最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能够拿到老师的逐字稿，相当于知道了老师上课所说的全部内容，那么直播、录播甚至线下课堂等形式是不是都可以取消，毕竟阅读的速度明显高于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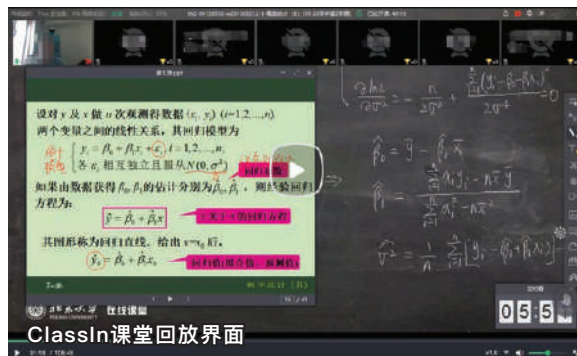
语速，而内容上并无差别。忙的时候我偶尔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利用网络软件将音频转为文档学习，自觉节约了不少时间。但在和多位同学交流后，我发现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从面对面互动到直播、录播、文字资料，一门课线下教学质量越高，每个环节所吞蚀的内容越多，这门课也无法为网课所替代。

许多优质课堂具有它独特的气质，老师的讲授带着现场氛围，那些集体的哄笑、无言的感动、灵感的碰撞、空气中的凝重，都是我们独坐在屏幕前难以感受的。北大中文系的李杨老师是学校公认的男神，上过他当代文学的学生无一不给予高度评价，北大树洞（匿名交流平台）中有这样一条评论：“电教的两个夜晚是我人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光……老师在课堂上读的《我与地坛》，现在想来也让人十分感动。”我想，正是这些珍贵的互动让线下授课成为必要。至于只需要阅读讲义、无需听课的误解，来源于相对无趣、刻板的课堂，当老师的讲授和读幻灯片、教材无异时，把他们“语音转文字”的确更加高效。

网课无法收获线下授课同等学习效果的另一大原因是考核方式受限。即便在北大、清华，考试作弊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不论采用多么严密的监考手段，网上闭卷考试始终存在较大的隐患，考试公平性难以保证。因此，多数闭卷课程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学期都将考核改为了论文或开卷考试。这么做的后果明显，学生摄取的知识量大幅减少。即便考核难度增加，论文所涉及题目范围不会太广，论文以外的内容学生没有必要掌握，开卷考也只需要学生通读考试内容，记忆的深刻和时长都不如闭卷背诵。

当然，考核的效果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的教学目标和用心，不少老师挖空心思在有限的条件下督促学生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比如北大一门法语入门课程就结合了开卷和闭卷两种考察形式，其中闭卷考有效避免了作弊，老师将需要学生掌握的600个法语单词打乱，在线上视频过程中随机为每名同学挑选6个，要求学生在25秒内说出它们的意思，学生务必熟练背诵所有单词才能不出差错。

总的来说，大学阶段的学习与小学、中学已经大不相同，对待学习，学生们自负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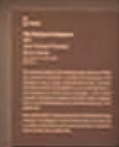
增加，老师们的义务减少。一门课动辄上百人，老师能做的只是尽可能让自己的课堂生动有趣，及时为同学们答疑解惑，至于每个人真正学到多少实在无暇顾及。更何况大学教授所承担的工作远不止教学。据学者分析，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各个大学的聘任条件和考核指标，主要集中在科研成果方面，包括科研项目级别、科研经费数量、学术论文等等，教学指标则相对容易满足。我虽然不清楚北大的考核标准，但北大作为中国顶尖高校，科研任务只会更重，即便对于教学质量有要求，老师们也难像中小学教师一样，将重心放在学生身上。作为学生，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的确，新冠疫情让我们远离课堂、在学习生活上面面对许多障碍，但每个人的收获始终取决于自身的学习态度。我们不妨抓住这个远离纷扰的机会，倾听内心的声音，让自己沉淀下来，静待重返校园的那天。

参考文献：

王忠堂、邓子玉、王芳、刘劲松、梁海成、李艳娟，《高等学校教授治学改革措施探讨》[J]. 教育教学论坛, 2016 (08) . 116-117.

(作者为宗乡总会奖学金得主、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学生)



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



文图 · 刘家明

今年是我国建国独立55年，那是一个值得大肆庆祝的日子，这么重要的庆典，一定要在有特别历史意义的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场举行。只可惜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大型的庆祝活动不得不取消，只能举行庄严的袖珍版，不过大草场仍然没失去它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幅美丽的油画

在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里，展出新加坡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过程的展厅里，有一幅以《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为名的美丽油画。这油画是由约翰·特恩布尔·汤申（John Turnbull Thomson）于1851年创作的。多亏了纽西兰律师费特列·乔治·霍尔·琼斯（Frederick George Hall Jones）的夫人捐赠，我们才有缘欣赏。

汤申原来是一名测量师，后来被海峡殖民地政府委任为总工程师，负责管理劳役的囚犯和各项民事建筑工程。汤申监督的工程非常的多，如修路、建桥、公共建筑物、医院，甚至麦里芝蓄水池和白礁的霍士堡灯塔等。今天，我国还有很多地标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例如汤申路、汤申山、甚至汤申选区，以纪念他的贡献。汤申也是一名自学画家，除了这一幅油画，他还留下不少写实作品，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作品，想象在没有照相机的早期殖民时代，新加坡人民的生活面貌。

解读《政府大厦前大草场》

我们先来看看这大草场，面向着油画最左边的建筑物（法院）的左斜下角，靠近新加坡河口（不在画里）的位置。那里就是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官员史丹福·莱佛士和威廉·法夸尔登陆新加坡的地方。这次的登陆开埠，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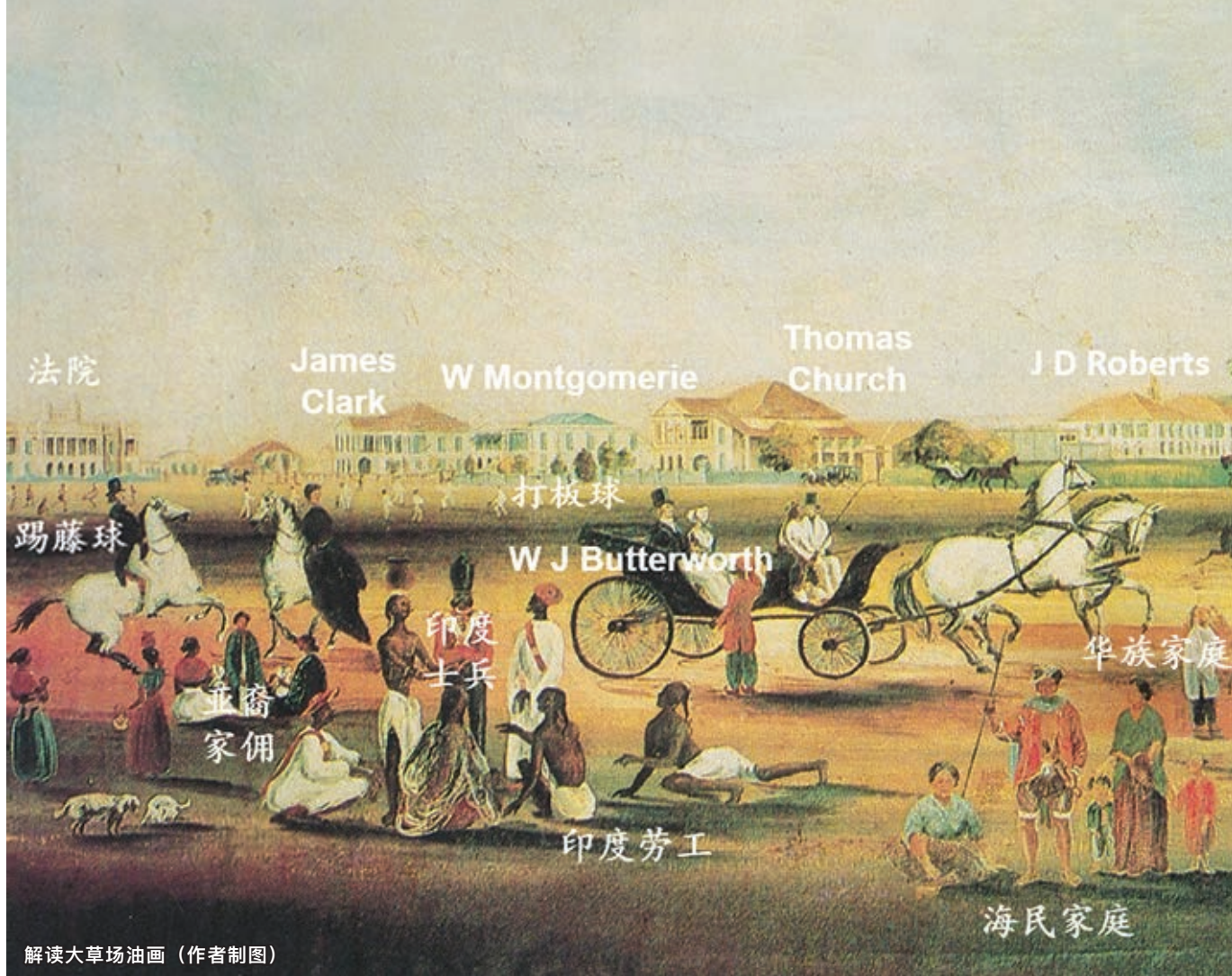
变了这个岛国的历史和命运。所以这一幅画里的大草场对新加坡来说就具有历史意义了。

英国人在规划城市时，早就把这一片大草场，当成是他们打球休闲的地方。大草场在马来文里是Padang，可能要与人民拉近距离，所以英国人也称之为Padang了。作画时是1851年，而新加坡、马六甲和檳城早已在1826年“合并”为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首府自1832年就设在新加坡，总督是威廉·约翰·巴特卫（W J Butterworth）。这幅画里的人、事、物非常的多和有趣，让我们慢慢来解读之。

大草场的旁边有很多欧洲式的建筑物，几乎全都是绘测师哥里门（G D Coleman）设计的，真的可以说是“哥里门建筑一条街”。我们从面向画的右边开始向左漫步，最先遇到的是圣安德烈教堂和阿美尼亚教堂；接着是Takoyee Manuk夫人的家，一般资料都说她是哥里门的情妇。继续向左走看到的是哥里门的房子，是他早期的寝居，后来他的爱尔兰正室就居住在后面的房子。哥里门真的算是左右逢源，享尽齐人之福，可惜英年早逝，49岁就病逝在新加坡。后面的两间是法庭秘书长J D Roberts充当寄宿招待所的房子和三间大气派的建筑物。顺序是海峡行政官Thomas Church，海峡医务官W Montgomerie（蓝色屋顶）和商人James Scott Clark的房子；



早期的海港水彩画（作者摄于国家美术馆）



最后最左边的就是由商人J A Maxwell的房子改装的法院了。

油画的背景是一座山，山上有英国殖民官的官邸，所以也被称为“皇家山”，也就是现在的福康宁山。皇家山虽然高不过48公尺，不过可以看到来往港口的船只。早期一幅Robert Wiber（1849年）的水彩画，画的就是从港口的商船看到皇家山的情形。在山上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的旗帜，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已经停泊在港口的讯号，以通知相关的服务人士，所以福康宁山也被称为“升旗山”。

我们可以看到大草场上正进行着各种休闲活动，有打板球和踢藤球；有欧洲人乘坐马车、骑马、散步；也有正在闲聊的阿拉伯人和华人商人和家庭，拿着鱼叉的海民家庭（orang laut）以及为这些西方人士服务的佣人、劳工、车夫和守卫士兵。汤申把自己（戴白色高帽）和巴特卫总督和夫

人也一起入画。画家通过这幅画反映了当时多元文化，多层阶级且层次分明的社会结构，在英国统治下社会一片和谐、安详，“歌舞升平”的景象。

殖民时代初期的社会

不过油画只是画出了画家心中希望看到的景象和憧憬，事实上当时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劳工抽鸦片、水手酗酒、抢劫、械斗和暴力罪案频频发生，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在展厅油画的旁边也展示了一口名为“里维尔”的铜钟（Revere Bell），是当时美国驻新加坡领事马里士他（J Balestier）的夫人在1843年送给圣安德烈教堂的。她要教堂每晚在8点钟后继续鸣钟5分钟，以提醒在户外的民众晚上不安全，无事快回家。这个鸣钟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874年，到殖民政府的警察制度较健全后才停止，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社会的混乱情形。



里维尔铜钟（作者摄于国家博物馆）

今天的大草场

过了两百多年，大草场到今天基本上都没有改变它原来的用途。除了开放给公众进行球类活动、消闲散步之外，也用来举办一些特别有意义的庆典和仪式。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接受日本投降的仪式；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后第一任元首的就职检阅典礼；从1965年独立开始，常在大草场举行的国庆检阅庆典等等。

因为大草场的原有建筑物早已拆除重建，最后变成高等法院和市政厅，再改为政府大厦，所以才会有“政府大厦前大草场”的称呼。2015年后，政府大厦和高等法院变身成为国家美术馆，为了怕国人还没有习惯，搞错地点，所以有时沟通时会加一个“前”字，变成“前政府大厦前大草场”。

（作者为本地电子工程师）



1965年国庆庆典（图片来源：2020年8月10日《海峡时报》）



2019年国庆庆典（作者摄）

讲故事大王

陈兆锦的多角色故事



文·沈芯蕊
图·受访者提供

有故事的人

儿时的记忆，欢乐与悲伤经岁月打磨、随光阴流逝，变得越发不真切。而每个人儿时都或多或少听过一些故事。那些有悬念、有戏剧冲突、生动活泼的故事会让人记忆犹新。故事的起承转合，情景剧一般的片段萦绕在头脑中，让人不能忘怀。

人在听故事中成长，同时也在编织着自己的故事。不同的是，有精彩故事的人，往往善于揣摩角色、融合多种技能、通过视觉形象、听觉形象，将故事表达出来。陈兆锦就是这样一个讲故事的个中高手！

在新加坡学习华语对于小朋友来说有些困难。相对于英语，华文字笔画更多，词意更复杂，在阅读理解上不那么容易。想要让小朋友爱上华文，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无疑是个好办法。

“讲故事不单要讲，还要与听者沟通而发生共鸣。故事动听，小朋友才有兴趣听下去。儿童的喜好诚实而直接，没兴趣会直接表现出来。虽然学习很辛苦，但至少让他们学得不那么痛苦。”

兆锦如是说。

从讲小动物的简单华语故事到“说古”讲历史故事，兆锦都能得心应手。他讲故事时边述说边绘画在白板上，连小动物的面部



表情和喜怒哀乐都表现得活灵活现。兆锦因具有深厚的舞台表演经验，他运用不同的声音、语气、动作来刻画人物，并通过不凡的线描绘画功力在白板上呈现，同时又声情并茂、绘声绘色，把故事讲得高潮迭起，唤醒了无数小朋友对中华话的兴趣。

他的语音字正腔圆，身为华人的使命感使他想把好听标准的华语教给孩子们。连不太听得懂华语的异族小朋友都被他所吸引。兆锦的故事讲得情真意切、语言所蕴含的情感表露充分、语言表达清晰因而扣人心弦，再加上边说边画，幽默诙谐而有趣的形式，这种运用全方位技巧说出的故事，让人不得不赞叹！孩子们在听故事时感觉身临其境，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在这故事的海洋里，孩子们肆意遨游，心灵也随之净化，潜移默化之中，让他们领略到了华族文化之美。

如此会讲故事的“故事大王”一定也有自己的故事吧？笔者在采访他时，亦如同看到一幕幕人生舞台的精彩故事……

童年的故事

陈兆锦1950年出生于印尼，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有千岛之国的美誉。其中有一个小岛叫仙丹岛，翻译成华语是钻石的意思。兆锦就出生在那里。

他的父亲祖籍福建，母亲则是当地的娘惹。外公是华人，外婆是娘惹，母亲为家中长女，按当地习俗早早就结婚生子。后来，外公及外婆带其他年龄较小的子女去了新加坡，这才有了后来他去新加坡投奔亲戚的机缘。

兆锦的父母共有10个子女，他在家中排行第6。他还记得大哥（比他年长很多）小时候送他去上学的情景。正所谓长兄如父，大哥一直很照顾他，一直督促他读书、写字。

陈兆锦这个名字是按辈分和其他兄弟取了兆字，锦字则是他独有。也许这是冥冥中的注定，后来家中只有他一人前往新加坡，才有了后来的锦绣前程。

他从小便有些与众不同，喜欢安静地读书，尤其喜欢读中国传统的绘本故事，像《红楼梦》、《封神榜》、《白蛇传》等。美丽的图画、精练的线条吸引着他，启发了他对绘画的兴趣。

在课堂里听着老师教华文，他觉得这语言真

是优美！他还因此迷恋上了华文字和书法！他还记得小时候教他华文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广州的老师。后来印尼排华，老师离开的时候，全校师生都去码头送行，依依不舍。

那时他心中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走出这个小岛，到新加坡去，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到可以学华文的地方去。他和父亲商量想去新加坡找舅舅。父亲对此事感到焦虑、也很担心儿子是否能在异国他乡独立生存。最后，父亲看到他态度坚决，便默默地为他寻找机会。

在印尼，他们虽为华人血统，但大家都讲印尼语。吃饭也不用筷子，而是按当地习俗用手抓饭。抓饭时，先把米饭盛在盘上，然后用右手指将饭捏成小团，再送到嘴里。然而，父亲却让他使用筷子，而非用手抓饭，想必心中早有盘算，认定这个儿子一定会离开印尼了。

有一天，父亲突然叫他马上收拾东西，说去新加坡的船就要开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心中懵懂慌乱，急忙找了些衣服和日用品就被父亲送上了船。当时，他因家中穷困，并没有带钱。父亲神色凝重地把他交待给一位相识的叔叔，便一转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船出海，风很大，浪湍急！而他的脑海中，全是父亲模模糊糊的背影。他只记得与船上的其他小伙伴都因晕船而呕吐不止。漂泊一天后，他们终于抵达新加坡。他乘坐的是运输货物的船只，想来当时海关并不严格，舅舅那时已在码头等他。舅舅在新加坡做牙医，收入还算不错，当时是开车来接他的。他记得车子的汽油味极重，



印尼小岛，大哥推着坐在婴儿车里（一岁）的兆锦



10岁的兆锦与父亲陈天禄合影

原本就晕船呕吐的他难受极了。到目的地后，他所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好不容易，看到认识的外婆，便一头扑到她的脚下……

那时舅舅刚结婚，还没有孩子，便决定让他住在姨母家。姨母家孩子众多，住在旧时甘榜的亚答屋。他知道自己是在寄人篱下，所以从小便懂得察言观色、乖巧勤劳，尽量帮家里做家务。

没有父母疼爱的童年是孤寂难耐的。远离父母及兄弟姐妹的生活，导致他沉默寡言，惟有画画和听收音机作伴。收音机里的华语和歌曲，可以让他凝神静听，得以慰藉。

那时他10岁，正是需要上学读书的年纪，可没有合法身份无法上学。彷徨、无奈！舅舅也很是着急，运用他的关系，托人帮忙，终于让他可以进入学校读书。一开始时入读植群小学，然后又转到同敬小学。他那时已非常懂事，没有了童年的天真，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要努力读书。他凭着一股韧劲，顺利读完小学，毕业后入读德明政府中学，进入戏剧组，开始展现他的表演才能。

1969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经新加坡电台吴雪妮介绍，兆锦参加了“儿童剧社”，剧社成为了他的艺术摇篮。他在剧社接受严格的舞台话剧、广播方面的训练，包括语言、表情、感情、肢体相关的表演训练。大家以剧社为家，很多人吃住都在剧社，他也帮助剧社售卖书籍。那些岁月使他得以锻炼成长，而且结交了许多良师益友。

开始时他带着印尼腔的华语，常因吐字不清、吞音，被教课认真的程茂德老师责骂。他知道自己根基薄弱要勤加练习。吞字是因气不够，他就勤奋练气、背诵台词、认真揣摩各

种角色，甚至平时说话都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严格要求自己。剧社每天都有活动，有讨论会，戏剧严谨与执着的态度非常感人，整个剧社热闹而富有激情。

青年的故事

1973年，陈兆锦按照政府的要求去服兵役，2年兵役结束后，1975年他拿到新加坡公民权。这一年，年龄渐大的一批人从“儿童剧社”出来办起“青年剧团”，一直到1983年结束。期间演出了《连锁案》、《三只瞎老鼠》、《皇帝的阴影》等剧目，颇受观众的欢迎。

陈兆锦高中毕业后便开始自己工作赚钱，教华文补习和画画，他的画作还被印制在T恤衫等商品之上。其实他并没有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只是凭借天赋和对绘画的热爱，从小到大都在不停地画，所以成年后竟可以以此为生。

1979年，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泛太平洋出版社”，任设计和绘图师，一做就是19年。那时他有了公积金，便开始准备自己买房子。他一直喜欢绘画，所以美术师是他真正想充当的角色。至于演员，他始终认为只能作为次要的角色，作为业余爱好就行。

有一句谚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真正让兆锦扬名的，确是“演员”这一“次要”的角色！

兆锦七八十年代与朋友们活跃在舞台上演出话剧、相声、快板、朗诵。他不但能演，还能编能导。在1984年以话剧《一条绝路、夕鹤》获得艺术理事会颁发的最佳导演奖。

兆锦的另一个才能是为电台写广播剧本。他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写作（当时都是手写），



70年代，兆锦（左一）在维多利亚剧院参加《文艺晚会》演出



70年代，演出由蔡曙鹏编导的话剧《青年画家》



80年代，青年剧团演出《三只瞎老鼠》剧照

他的字迹整齐而美观，而且写得非常用心，哪里需要配乐和需要表现出内心世界的感受，都用括号标注得清清楚楚，因而其剧本受到电台编导的青睐。

他和好友华亮搭档说相声时，一个偶然的机
会，认识了电视台已故导播陈盛安，邀请他们去演出，这开启了后来演艺生涯的新篇章。当时陈兆锦的第一反应是想拒绝，他说没有胆量，让华亮自己上台。当时是1985年，公司刚好派陈兆锦去香港的分公司工作，负责设计部。在此期间好友华亮一直写信给他，邀请他回来共同演出，说和别人演出没有默契。1986年新年时，他回到新加坡，与华亮共同去电视台演出。

他们在电视台创作了不少以生活为题材、脍炙人口的喜剧小品，把诙谐幽默与欢笑带给了千家万户，风靡新马一带，深受民众欢迎。

两人最初以谐剧《打针》走红，得到《海峡时报》整版报道，轰动一时。虽然当时很红，可兆锦始终认为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绘画和设计的作品完美呈现并按时交稿。演戏都是利用业余休息的时间，虽然很辛苦，但“演员”的角色，让他在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他愿意为之付出。

他和华亮组成“大嘴巴和大鼻子”的搞笑组合，在电视上表演多个搞笑节目，如“开心双响炮”、“卡拉OK名人榜”、“镭射DJ”、“礼貌短剧”等，是新加坡继王沙、野峰之后，一对备受观众欢迎的搞笑组合。

1995年，华亮突然遭遇意外过世。兆锦痛失挚友，也顿时陷入抑郁。那时还好有朋友们的支持和他内心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使他坚强地走了过来。之后，他依然演戏、主持节目。他将绘画更好地融入了教学，在教师这个“角色”上增添了人生的砝码。“人活着不能没有价值和意义，要有目标，努力奋斗。人生中变化无常，一个时期结束了，下一个时期总会到来，幸运会静待你勇敢前来。”兆锦如是说。

壮年及现在的故事

时间到了2001年，兆锦已年过五十，在偶然的机缘下，他加入“丽的呼声”广播电台做兼职主持人。在8年的时间里，每逢星期一晚上，他专注地播音、播歌，与老歌对话，用人生感悟



与深厚情感描述介绍，给那一首首怀旧金曲赋予新的生命力。

时光荏苒，兆锦活跃于本地艺术界和教育界，例如：导演话剧《风雨牛车水》（南洋艺术学院）作为SG50的献礼，深受演艺界好评；2018年新加坡绘本嘉年华特邀陈兆锦为嘉宾；新加坡作家论坛大赛也邀请他做评委；他亦是新加坡教育部华文推广组委会指定嘉宾；更是本地教育界边画边说故事的“故事大王”，在本地教育界声名显赫。

他目前致力于教学工作，以卓越的绘画技巧、生动丰富的语音、语调以及肢体语言营造故事里所要表达的气氛。他在新加坡各间学校教授《口才训练课程》，以提升学生们的口语表达和阅读技巧。兆锦将舞台表演、绘画技巧、华语教学融为一炉，打造出独树一帜的“故事大王”人生角色。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活动不能进行，课程也改为线上教学。兆锦把大舞台变成给学生上课的小舞台。他觉得把华族文化传播给孩子们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使他可以用自己“多角色”的技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不能出门的那段时间里，他独自在家不能走亲访友和出门教课。他表示面对着四面墙壁，无人交流，有些老人甚至会患上忧郁症。兆锦则

利用这独处的机会在家专心绘画，创作了许多美丽的画作。他的心得是：年轻人应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不然到年老时会无所事事，生活变得空白无聊。

兆锦坦言：YouTube上李子柒的视频让他很向往那些乡村生活，恬淡自然。他一直单身，山有木兮卿有意，他有过爱情却不够完美，所以他把对下一代的期望寄托在兄长的孩子身上。他把几个孩子从印尼接来新加坡供他们读书，让他们有一技之长将来有良好发展。现在孩子们都很独立，生活得不错。

兆锦说，如果年纪大了而无事可做，人就会老得特别快，没有价值人就衰老。现在他把教育下一代作为己任，而且一直教课也可以练习自己的声音不衰老。“不烟不酒健康生活，找到人生的真谛发挥自身才华，不要过平庸的生活。岁月可以把痕迹写在脸庞，心中却要留着希望！”兆锦如是看。

今年他本来要去中国举办一个讲故事的活动，宣传海报已经印好，可因为疫情耽误不能成行。“希望疫情快些过去，让他这个有故事的人，能够继续讲更多精彩的华文华语的故事。”兆锦如是盼。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边说边画，是兆锦讲故事的特色



孩子们簇拥着故事大王



一个新加坡民间故事的海内外传播： 以《红山的传说》为例



文图 · 蔡曙鹏

《红山的传说》是个有四百多年历史的传说，源自记载在《国王宗谱》（Sulalatus Salatin）（又称《马来纪年》）的一则叫《新加坡拉被剑鱼袭击》（Singapura Dilanggar Todak）的神话色彩浓厚的民间故事。《马来纪年》成书于1612年，是由当时的柔佛州专职负责人Yang di Pertuan Di Hilir Raja Abdullah进行整理的。像许多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一样，后来流传的文本，进行了许多更改，名称也有所改变。原来的题目《新加坡拉被剑鱼袭击》意味着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适合搬上舞台。

许多年来，《红山的传说》不断被翻译、改写，搬上舞蹈、话剧、戏曲、木偶戏的舞台，或写成小说、诗歌、编成绘本，也曾搬上银幕。^[1]今年，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还呈献了一个以少儿观众为对象的小舞剧版本。在英殖民地时代，许多作家与官员从不同角度重塑红山的传说。近十几年，新加坡的表演艺术家深入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虽都取材自《新加坡拉被剑鱼袭击》，但作品的立意与主题，各有特点，反映了新加坡舞台上多元文化演出的趣味与意义。更有趣的是

当越南国立丛剧院（Vietnam National Tuong Theatre）移植此剧时，增加了多个非马来人的角色，把故事发生地“多元民族化”，为故事注入了新的想象。这里举四个例子，探究各门类艺术创作者的思路，对照不同传播经验的成果。

民间传说往往与过去的历史事件有关。史籍有剑鱼袭击占婆（今越南的岬港）、巴达维亚（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名）、达鲁三（今印尼巴东附近）和泰国的北大年的记载，可见剑鱼曾经在东南亚多个地方出没。《新加坡拉被剑鱼袭击》明确叙述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近至1973



2020年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的小舞剧《红山的传说》首演剧照

年，仍旧有剑鱼出没于樟宜的报道。^[2]《马来纪年》成书之前民间的口头传统和后世文人依据一定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历史想象，使得剑鱼的故事与人物的叙述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深刻。但是，历史的真实性也在这些传说的转述与改写中变得越发模糊。之后的讲述和复述，以及各种版本的变化，在文化上构建地方的象征意义。从过去的编舞家、戏剧家和偶戏创作者的不同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不同门类的艺术家们如何选择故事中的事件，并对其结构进行不同的调整，变更重点。故事的每次重述都揭示了创作者的不同考虑。

戏曲版的《红山的故事》的海外传播

先说说新加坡戏曲学院先后制作的两个《红山的故事》版本。一是2005年张莉导演的秦腔版在印度新德里首演，一是2008年林宏带队在日本富山首演的少儿黄梅戏版。秦腔版的《红山的故事》，2005年作为教学节目，由新民中学戏曲学会六位马来学生和六位华族学生合演。同年8月30日受邀到新德里参加由印度文化关系理事会主办、雷恩国际学校承办的第七届国际儿童表演艺术节。主办方把《红山的故事》作为压轴节目，安排在9月4日闭幕礼上演出。少儿黄梅戏版台词唱词改为更浅易的语言，于2008年7月31日至8



新民中学马来与华族学生合演的《红山的传说》，展现独特审美趣味



崇福学校在富山国际儿童表演艺术节演出的《红山的传说》，获得日本剧评家窪邦雄的赞赏

月5日受邀参加了在日本富山举行的国际儿童表演艺术节，演出者是崇福学校的学生。

戏曲版的《红山的故事》保存了民间传说里机智村童纳丁和残暴统治者的基本情节架构。增加了村童纳丁的母亲法蒂玛和给纳丁加上莫须有罪名的宫廷主管阿旺这两个角色。阿旺无能而刁滑，他对付剑鱼的愚蠢献议导致人员伤亡而告失败，与纳丁的消灭剑鱼成功妙策成鲜明对比，颜面丢尽。阿旺因嫉妒而愤恨，想出陷害纳丁的毒计。糊涂的国王竟然相信阿旺伪造的信，以为纳丁真的要当暹罗国王的内应，卖国求荣，于是派阿旺带兵追杀纳丁。最后，阿旺掷剑刺死纳丁。突然红雨倾盆，山地土崩，纳丁被阿旺杀害。阿旺被雷击中坠下山去，红山被纳丁的鲜血染红。第七届国际儿童表演艺术节创意总监Utkarsh Marwah看戏后说：“第一次看到新加坡的民间传说由不同民族的中学生合力演出，体现了新加坡艺术教育从小培养族群关系和谐的意识。用华族戏曲演绎马来故事，对印度观众来说，有独特审美趣味。”许振义博士在《布衣南渡》里这样评述：“剧作者蔡曙鹏的台词仿造马来四行诗班顿（pantun），尝试在风格上展现马来文化。开场补渔网的马来舞，突出地方色彩。”

在日本，黄梅戏版的《红山的故事》也被选为压轴节目之一，于2008年8月5日在富山Aubade大剧院演出。日本剧评家窪邦雄写了文章表扬崇福学校的小演员们的演出，说他们戏曲的基本功不错。对剑鱼袭击村民与士兵追杀纳丁两场戏，通过投影，放大了剧中人行动的戏剧性，特别欣赏。窪邦雄说：“从这个新加坡民间传说看到地方风物、礼仪习俗、马来舞

蹈。故事寄寓着民众对红山村童被杀害的事件的评价，发人深思。”

新加坡英语木偶戏《红雨，红山》 获得金奖

第二个例子是2008年2月16日至24日到河内参加首届国际木偶艺术节的获奖节目《红雨，红山》。这个由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和越南舞台艺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盛会，来自中国、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埃及、比利时、瑞典、以色列、巴西和东道主国家越南共11个国家的17个木偶剧团各显神通。演出团队呈献的节目包括提线木偶戏、杖头木偶戏、布袋戏、皮影戏及桌上小木偶，多姿多彩。

《红雨，红山》的导演杨瑞明，艺名叫法兰基马拉济（Frankie Malachi），土生土长的他，在2004年的创立了能演出多种类的偶戏剧团。他的《红雨，红山》取材自新加坡1975年Federal Alpha出版社的《红山：新加坡的民间传说》。作者Chia Hearn Chek，结尾与原著差异较大。开场描述剑鱼袭击新加坡，不少渔民受伤。村童纳丁献计，砍芭蕉树干置于海边。剑鱼猛刺芭蕉树干后，进退不得被捕杀，剑鱼之患解除。村民盛赞纳丁，说他将来长大，必是国家栋梁。对此苏丹十分嫉妒，遂派人到山上住处杀掉纳丁。不料草房里出现了一位白发极长的老婆婆。士兵们气急败坏，威胁她把纳丁交出来，否则把她杀掉。这时，突然电闪雷鸣，红雨倾盆而下，满屋烟雾弥漫，老婆婆也不见了。士兵们见势不妙，逃之夭夭。红雨染红了山，纳丁神秘失踪。

杨瑞明一人扮演多个角色，他的专长是提线木偶。古称悬丝傀儡，演员一面要说台词，一面要对人物动作进行仿真，能力必须超强。木偶的头、手、脚、肩以及躯干共缚了十七条多丝线，指尖控制着身体的不同部位。若有丝毫差错，轻则动作难看，重则丝线纠缠。团队里的张兴强、何燕云、苏宝玲、郑国贤，各显身手。精湛技艺赢得观众和评委的一致赞赏，杨瑞明获得国际偶戏艺术节金奖。来自印尼的评委Tupuk Sutrisno（前印尼驻乌干达大使，亚细安偶戏协会秘书长）这样评述：“我喜欢这部戏的结尾，没有原



英语提线木偶戏《红雨，红山》主要演员何燕云（左）、张兴强（中）与杨瑞明团长（右）

来故事的鲜血染红一座山的场景。下红雨吓退恶人，多么有浪漫色彩的一个好结局啊！杨瑞明非凡的技艺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他的小狗，就像真的一样。希望亚细安偶戏协会办个大师班，让更多本地区偶戏从业者受益。”后来，果真办了培训活动，大受欢迎。

马来舞剧《背叛》

第三个例子是最近获得首届“新加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奖”得主马来文化团体美丽遗产（Sri Warisan）根据《新加坡拉被剑鱼袭击》改编的马来舞剧《背叛》。舞蹈团创意总监马丽娜尤碧尤索夫（Marina Yubhi Binte Md.Yusoff）设置了一个叫做阿曼的角色。阿曼是《红山的传说》的中心人物，他是机智村童纳丁的母亲收养的孤儿。阿曼比纳丁年长，两人为养兄弟关系。风华正茂的阿曼，因为英勇领导村民击退海盗有功，被国王委任为财务主管。纳丁献计消灭剑鱼有功，宫廷主管孟满达因嫉妒而想出在国王面前陷害纳丁的情节与其他版本大同小异。但国王借刀杀人，命令孟满达威逼阿曼将纳丁丢进海里的情节，是其他版本没有的。阿曼是纳丁母亲养大的孤儿，心里最初有矛盾，但最后选择向强权低头，背叛良心让恩人的儿子葬身鱼腹。阿曼没有想到的是，他没有因为执行国王的命令而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被宫廷主管孟满达推下海溺死。幕落时，只见孟满达站在舞台中央，冷酷的脸上露出几分得意，村民百般无奈，有口难言。

《马来纪年》清晰论述了关于统治者与老百

姓应有的关系，可看作是马来古法典的源头。

“国王有义务改善人民的生活，否则王国会遭到全能之神的毁灭。^[3]老百姓必须认可国王的统治权，忠于国王，不论国王是否做出不公正或粗暴的决定。若人民抗争，则是背弃信义（原文为derhaka）”。^[4]舞蹈团常务董事阿德尔（Adel）说：“舞剧‘背叛’悲剧的结局让人惆怅，留下问题思索。我们还要编下集。请观众等待”。

从艺术角度看，这部2012年3月31日在嘉龙剧院首演的舞剧的成绩有三方面。一是成功邀请马来西亚和印尼两所艺术名校——马来西亚国立艺术学院和印尼国立艺术学院（日惹校区）参与演出。前者有11名舞者参加，后者派出14名音乐员。加上美丽遗产舞蹈团团员、育英中学、育青中学和达迈中心学生，阵容强大。这是个为三个国家热爱马来艺术的年轻人搭起友谊大桥的大制作，意义深远。二是打造原创剧目，考验团队创造力、挖掘主创人员的潜力。台前幕后参加人员，多达两百名左右，提高了舞蹈团的行政力与组织力。三是巧妙运用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简称LED），使整个舞台呈现出立体画面景象。椰叶婆娑起舞，或白云飘浮蓝天，或大海汹涌波涛，能在瞬间转换，为舞蹈表演营造所需舞台效果。最可贵的是舞剧《背叛》的音乐、舞蹈和灯光设计，都达到专业水平。结局让主角纳丁遭受苦难和毁灭过程中表现的悲剧精神，很有震撼力。他的死亡，引起观者的悲痛、同情与思考。

越南丛剧版《红山的传说》的新内容

第四个例子是越南国家丛剧院为庆祝越南、新加坡建交45周年创作的丛剧《红山的传说》。丛剧是越南的三大传统戏剧种之一，产生于13世纪的陈朝，历史悠久。在新加坡驻越南大使馆与越南驻新加坡大使馆的支持下，丛剧院呈献《红山的传说》与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马来舞蹈团DIAN Dancers和印度艺术协会合演的舞剧《老榕树的传说》，2018年8月6日在河内红河剧场隆重公演。这是两国院团互演对方的民间传说的一个有趣的文化外交项目。

丛剧版由丛剧院范玉俊院长担任艺术指导。

阮士职编剧、黎珍荣作曲的版本非常有趣，将故事改为发生在一个多元民族的渔村。范院长说：“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和谐社会，是亚细安人民很钦佩与仰慕的。因此决定将故事地点改为一个有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和谐相处的渔村。这样更加‘新加坡’。演员学习马来、华族与印族的舞蹈，作曲黎珍荣把新加坡各民族的音乐元素，融入一些角色的唱腔里面。头一次尝试跨文化剧目，不一定成熟，但肯定观众会觉得耳目一新，我们创作过程，也很兴奋、乐趣无穷。”晚会的嘉宾之一的印度驻越南大使Harish Parvathaneni阁下，非常赞赏这台庆祝越南、新加坡建交45周年的晚会，“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合作项目，表达了两国艺术家共同探索新路的理想与愿望”。2019年10月24日至28日，丛剧《红山的传说》受邀到印尼苏拉威西省万加锡市参加国际艺术节，反应热烈。观众除了演员与乐队的精彩表演外，对剧中出现的马来班顿与马来谚语，感到特别亲切。印尼大学蒲天雪（Pudentia）教授点评道：“1995年菲律宾学者Eugenio Damian主编的《亚细安民间文学选集》出版，让我们读到邻国民间传说。但是像越南丛剧院这样的把一个亚细安成员国的民间传说立在舞台上，带到另一个亚细安国家演出，太有意思了，这就是亚细安精神的体现”。

正如新加坡国际基金会执行董事长陈丽娟所说的，公共外交的核心是对一个国家的价值、文化和政策的意识，了解和欣赏。通过交换思想、技能和经验，促进相互尊重和亲和力；通过合作和建立关系的项目，完成加强国家之间的联系和人民之间信任。丛剧《红山的传说》的海外传播的例子，说明了成功合作项目，能有力地促进他国观众对自身艺术传统的认知与欣赏，进而增



The Story of Bukit Merah: A Singapore Tale o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Stage

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新加坡和越南的艺术团队也因为这个项目，会继续探讨交流的可能性。

尽管新媒介环境下的今日，民间传说的海外传播可以通过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技术的形式展示、或互联网大数据驱动的知识图谱、或通过网络甚至短视频进行快速传播，但不同国家的艺术家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与合作，意义与效果大不相同。

注释：

- [1] 1962年，邵氏电影公司的马来电影制片厂拍了Singapura Dilanggar Todak, 由Omar Rojik执导。
- [2] Ahmad Hikmat, "Gempar Todak Langgar Changi...Tapi Kemejan Yang Tersadai", Berita Harian 28 August 1975, p.1.
- [3] Brown C.C., trans. Sejarah Melayu or Malay Annals.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6.
- [4] Brown, Sejarah Melayu, p.16.

参考文献：

1. Sim, Mei Jun Sophie (沈美君), Fishy Tales: Singapura Dilanggar Todak as Myth and History in Singapore Past, 2005. An unpublished Master of Arts thesis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 Tan, Jean (陈丽娟), "Connecting and Collaborating to Change the World: Diplomacy in the Palms of Citizens" in Commentray, Volume 26, 2017, p.150-158.

题图说明：

马丽娜尤碧尤索夫为美丽遗产马来舞蹈团编创的《红山的传说》，演员近两百名演职员，场面壮观

(作者为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民族音乐学博士)

"Singapura Dilanggar Todak" ("Singapore Attacked by Swordfish") is an episode in The Malay Annals a literary work originally titled "Sulalatus Salatin"(Genealogy of Kings). The text has undergone many changes, with the oldest known version dated May 1612, through the rewriting effort commissioned by the then regent of Johor, Yang di-Pertuan Di Hilir Raja Abdullah. The dramatic title implies that the story is suitable for theatrical presentation.

Folktales relate to historical incidents of the past and in this case, the swordfish that traumatised the coastal villagers of Singapura. The story brings the place to life as it gives identity both to the place and to the people who tell the legend. The telling and re-telling of the story, with variations, help the people to define and culturally construct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place thus contributing to a sense of cultural belonging. From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s created by choreographers, dramatists and puppeteers in the past, we could appreciate how the different artistes select the incidents in the tale and place different emphasis on the plots they structured. Each re-telling of the story reveals the different considerations of the respective creators. Selected for discussion here are four examples of local and foreign productions.

The first example is the Chinese opera version in Qinqiang and Huangmei genres created by the Chinese Opera Institute in 2005. The former premiered in New Delhi at the International Childre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in 2005 by students of Xinmin Secondary School and the latter was performed in Toyama at the International Children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in 2008 by pupils of Chongfu School. The Chinese opera script adds a character called Awang who serves as the Sultan's chief of staff at the Palace. He is jealous of the boy who outshone him as his idea of fighting the swordfish failed while the boy's suggestion worked. Fearing that the boy's fame would threaten his position Awang informed the Sultan that the boy is a traitor who had colluded with the King of Siam to attack the Kingdom, and the boy was executed for a crime he did not commit. The contrast of good and evil is apparent for the young audience to appreciate the moral of the story.

The second example is the English puppet show "Red Rain, Red Hill" created by Frankie Malachi, the foremost puppet maker and puppeteer in Singapore. He was among the 12 foreign productions at the 1st International Puppet Theatre Festival in Hanoi, Vietnam in 2008. "Red Rain, Red Hill" is adapted from "Folktales from the Orient -The Redhill: A Singapore Folktale" by Chia Hearn Chek. Ambassador Tupuk Sutrisno, one of the adjudicators who knows the original story well was very pleased that this version spares children audiences with the killing scene. The show ends with the appearance of an old woman with long white hair when the soldiers approach the hut where the boy they are after is supposed hiding. Suddenly red rain pours, and the soldiers are scared and flee. "Frankie's exceptional skills are impressive, and the ending gives the story a colourful romantic imagination.", said Ambassador Tupuk. Frankie won an award as Outstanding Artist.

"Bendahara-A Betrayal", the Malay dance drama created by Sri Warisan in 2012 is another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 It focuses on a new central character Aman, the adopted brother of Nadim, created by the Creative Director Marina Yubhi Binte Md. Yusoff. Aman had been looked after by Nadim's parent from young. He was promoted by the Sultan to a Bendahara after he defeated the invaders. Then came the swordfish attack that leads to many casualties. The problem was solved by Nadim's clever proposal of using banana trunks to trap them successfully. Memanda Menteri, a high official trusted by the Sultan sees Nadim as a threat to his position. He obtained the Sultan's instruction to order Nadim be thrown into the sea. After some initial hesitation, Aman carried out the instruction on a ship. To his astonishment, he himself was pushed by Memanda Menteri into the sea and drowned. This production raises questions about courage, principles and justice when one faces brutal power. The dance drama was one of the Sri Warisan's biggest success with 76 artistes from Indonesia,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nother example is "Tale of Bukit Merah" adapted by the Vietnam National Tuong Company to commemorate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Singapore and Vietnam in 2018.

Vietnamese playwright Nguyen Sy Chuc adds several Chinese and Indian villagers thus giving the story a new multicultural dimension. It also gives the opportunities to showcase Chinese, Malay and Indian dance. The presentation includes Malay Pantun, a Malay poetic form as the Chinese opera script. This feature was much appreciated by the Indonesian audience when the show was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in 2019 in Ujungpandang, Makassar, South Sulawesi, Indonesia.

These examples show the sustained interest in re-interpreting and staging of tales from Singapore by local and foreign arts groups in the region and continues to give infuse new meanings to an old story.

“柠檬”的秘密



文·尤今

办 公室外，那个名字唤作高杰平的16岁的少年，两只手散漫地插在口袋里，身子歪歪斜斜地倚墙而立，满脸的桀骜不驯。灿亮的头发，闪着挑衅的亮光；冷漠的双眸，明明白白地写着对周遭世界的蔑视。

我和他的母亲苏珊，面对面地坐在办公室里。沉默，是我们此刻的语言。我在心里琢磨着适当的用词，她呢，白皙的瓜子脸绷得像满月的弓，不是生气，而是担心从我嘴里流出来的话会让她的脸再次淌血。

这已是我这个学段第三次约见她了。

教学多年，我常常得因为学生行为的不端而约见家长。每回听了我的陈述后，家长的反应各各不同——有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护短、有者凶悍无礼地反过来指责老师、有者气势汹汹地在众人面前辱骂自己儿女、有者涕泪滂沱地哀求老师从轻发落、有者一脸漠然地任由校方处置，林林总总，都有。然而，像眼前这样温文有礼而把一切过错往自己身上揽的，却不多见。

高杰平是学校里公认的“问题人物”——迟到早退、无故旷课、作业不交、顶撞师长……

屡劝屡犯、冥顽不灵。

身为他的级任老师，每回一听到他的名字，便有两只鼓锤“咚咚、咚咚”一下又一下地敲着我的太阳穴——其他科目的老师，走马灯似地来向我投诉，我即使多长四只耳朵也不够用。

我多次把高杰平找来，细谈、详谈；劝告、警告，他呢，要不就是阳奉阴违，要不就是一

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行我素。我纵使有着囤积成吨的耐性，也慢慢被他磨光了。

束手无策，只好约晤他的母亲苏珊。

第一次看到任职于跨国公司的她，暗暗赞叹她仪态的优雅。穿着一袭鹅黄色的套装，衣襟上别着一支玲珑的翠玉胸针，在云淡风轻的温婉里，透着些许掩饰不了的焦虑。她安静地坐在我面前，专注地聆听。

我呢，像俘获了一堆“赃物”的警员般，把其他老师的投诉，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摊放”在她面前……

——“他数学测验交白卷，老师循循善诱，他居然说：你打零分不就成了事了吗？干吗对着我啰里啰嗦的！”

——“他用福建粗话骂英文老师，面对训育主任，他理直气壮地自我辩护：她又不会说福建话，竟然敢投诉我骂粗话！你去叫她把我讲过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一遍，看看我是不是真的骂粗话！”

——“他在历史测验的试卷上写道：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你竟然还叫我写发生在1819年的事，不是很荒唐吗？”

——“地理老师的作业，他做得乱七八糟，老师在卷末写道：杰平，来见我！他竟然在卷子上如此回应：你又不是总统，我干吗要去见你？等你当上了总统，再召见我吧！”

——“训育主任要他把金色的头发染回黑色，他居然噤里啪啦地说道：我的头发是天生金色的，金碧辉煌，不好吗？你干吗要我染得像

你一样黑漆漆的前程无亮呢？”

苏珊听，静静地听，听着听着，眼圈渐渐发红，她用力吸了一口气，让眼泪逆着方向流，我清楚地知道，她的心房已被砸开了一个缺口，当眼泪流进去时，恐怕有一种热辣辣的痛楚吧！

半晌，开口时，她湿湿的声音，满满的都是歉意：

“老师，对不起，实在对不起，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我工作太忙，没有把他教好，是我失责。往后我一定会想办法，好好管教他。老师，请您放心，我一定、一定会好好辅导他的。”

接着下来的一段日子，高杰平言行举止果然收敛了不少。有时，老师骂他，他双唇翕动，眼见舌上的刀和箭都蓄势待发了，然而，紧接着，他却咽了咽唾液，把利利的刀和毒毒的箭硬生生地咽下了。我欣慰地知道，他母亲的确有对症下药地辅导他的。只是，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到底是不是“海市蜃楼”呢？

果然，不久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他常常无故逃课、旷课。问他原因，他抿着嘴，不答，像一尊顽强的石像。

他既然已经化为一尊石像了，我又如何能够撬开他的嘴巴呢？

无计可施，我只好再次约见他母亲苏珊。

依然还是非常得体的装扮，柔软的丝绸衣裙是紫色的，很淡很淡的那种紫，肩上搭了一方图案繁复而色泽艳丽的丝巾；素净与斑斓的配搭，使她看起来既温暖又亮丽。

我把高杰平的问题交代完以后，坦白地对她说道：

“我觉得杰平是个很不快乐的孩子，他心里好像藏着很多事情，可是，他不肯开口，我们都束手无策哪！”

此刻，苏珊清澈如水的眸子突然涌出了一种宁静的孤寂，半晌，才缓缓地开腔说道：

“不瞒您说，杰平的父亲，前年病逝。他和父亲的感情一向很好，父子俩都热爱户外活动，常常一起打篮球、游泳、徒步，也一起练柔道。世界足球赛举行时，他俩一起观赏，笑声几里可闻。失去了父亲后，他的心里也失去了平

衡，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家里不言不语，您说他像尊石像，真的像啊！现在呢，也是一样，碰到心情不好时，一天24小时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知道他不快乐，可是，我们没有共同的嗜好，也就缺乏了共同的语言。我一直在物质生活上尽量满足他，但是，在他的精神生活里，我一直都缺席。”顿了顿，继续说道：“都怪我没有把他照顾好，才让他在学校惹出那么多麻烦。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老师，请您多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和他沟通。”

她不断地道歉，倒好像犯错的人是她。

接着下来，母亲与他的沟通似乎产生了正面的效果，他不再无故旷课了。

可叹的是，太平的日子过不了多久，却又发生了一桩令校方大为震怒的事。

高杰平在上课期间溜到附近的购物中心去抽烟，有人拨电向校长举报。训育主任赶去，找到他时，他死活不肯随他回返学校。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态度嚣张地喊着说：“在学校，你是训育主任，我犯错，你可以惩罚我；可是，现在，我在购物中心，你管不着，我要做什么，是我的自由！”

逃学、抽烟、藐视师长、出言顶撞、抗拒管束，这种种犯规的行为加在一起，高杰平已经踩在校方的“地雷”上了。

我第三度请苏珊到学校来，慎重地要求她在“行为保证书”上签名。日后，如果高杰平依然故我，便得面对开除的后果了。

这一回，她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拿起笔，签。晶亮的眸子里噙着薄薄的泪光。我看着她，心里好像被蜜蜂蜇了一下。啊，母亲的眼泪、还有，眼泪里的痛楚，为什么高杰平总看不到呢？

过了几天，升旗礼过后，苏珊竟然不请自来。她手里提着一篮红彤彤的樱桃，篮子上，还打着一个花里胡哨的蝴蝶结。

在我面前坐下来，她神情平静地说：

“老师，我今天来，是想告诉您，我已经辞职了。以后，每天早上，我会亲自接送杰平往返学校。我希望能与老师们密切合作，一起把他教好。”顿了顿，又说：“我过去有错，不能

科技与人文关怀

谈爱上中华文化的李约瑟



文图·张夏帏

一错再错。”

为了把孩子教好，苏珊毅然放弃了跨国公司薪金优厚的职位，当个全职母亲，兼代父职。这种“壮士断臂”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她离开后，我与同事一起分享她送来的樱桃时，不由得想道：目前的高杰平，就像是一个又酸又涩的“柠檬”，令所有的老师蹙眉；可是，有了这样睿智而又明理的母亲，在不久的将来，他也许会转化为一颗甜滋滋的“樱桃”吧？

辞职后的苏珊，在与儿子近距离的接触下，发现了一个久藏的惊人秘密：高杰平在丧父之后，无法承受内心巨大的痛苦，已经患上了轻度的忧郁症，可是，多时未被发现，当然也没有寻求治疗，他淤积于心的不安、焦躁、烦闷、不甘、无奈、愤怒，慢慢地便转化成种种为他人难以容忍的出格行为了。

苏珊带他去看心理医生，让他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

医生的爱心治疗、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加上老师的温馨支持，多管齐下，高杰平那张比石头还要硬的脸，终于慢慢地柔化了，甚至，隐隐约约地浮现了笑意。

至此，大家都闻到了春暖花开的气息了。

我深切地感觉，在孩子蹒跚学走的道路上，家长和老师，一个是左手、一个是右手。左手和右手，必须彼此协调，分工合作，才能确保孩子前方的道路走得稳健、走得顺畅；就算偶尔在雾气迷蒙的崎岖山路里迷失了方向，也能在左手和右手共同的扶持下，回返阳光普照的大路。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1983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汉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专题讲座。当他精辟的演讲完毕后，一位听众好奇地问这位英国学者：“为什么会穷毕生精力埋头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这位83岁高龄的科技史权威毫不犹豫地回答：“很简单：为世界人民大团结 (Very simple: world solidarity)。”即刻，25号讲堂里的数百名观众报以雷鸣般的热列掌声。

在冠状病毒肆虐下的阻断期间，我特别关注全球抗击疫情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时局，宅居于家频频上网浏览和观看朋友传阅的即时新闻与论析。在所接触到的大量讯息当中，有一系列著名美国经济学家李察·吴尔夫 (Richard Wolff) 录制的视频，其中一段题为“吴尔夫回应：中国偷窃知识产权的行为” (Wolff Responds: China's Intellectual Theft)，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段长约7分钟的视频，其中提及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的部分，让我不禁想起36年前出席的那场在水泄不通的讲堂里的演讲，还有自己曾以《海峡时报》记者身份跟他本人与合作伙伴鲁桂珍 (1904-1991) 访谈时的那股感动和兴奋，触动了我重新翻阅书架上几本有关李约瑟的书籍，也勾起了学生时代在马来亚大学修读李约瑟合作学者何丙郁教授所授课程“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回忆，因而萌发写本文的动机。

吴尔夫教授任职于美国麻省大学，其著作学说极具影响，活跃于公共论坛，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尤具有颇高的姿态与能见度，对时局如国际政治经济、中美贸易战、冠状病毒疫情等课题，通过视频做出阐述与分析。

对于美国主导的西方舆论，不断重复中国人掠夺、偷窃他们的知识财产的指责，并当作贸易战中制裁封锁华为通讯系统的主要原因，吴尔夫深感不以为然，认为历史上军事冲突如两次世界大战都由经济冲突与贸易战而起，相关的国家应以此为戒。美国对中国欺骗及偷窃的指控从两国贸易战开始至今已变本加厉，他觉得主张中国的科技发展要靠窃取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财产的说法，显然含有种族主义的色彩。

“世界科技的发展和流传向来都是通过转移的，各国因环境条件各异，闻道有先后，发明有早晚，后进向先进学习，在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迎头赶上。各国科学家通过学报、研讨会在各领域里交换心得，互通有无，相互提携，促进科技发展。这才符合历史上有智慧、有人性的互助交流来加速科学进步的规律，若到头来却翻脸指责对方骗取、偷窃，那就有失信背约之嫌了。”吴尔夫教授说。

他还指出：过去的30年来，未曾有人强迫美国企业进军中国，利用中国廉价劳工与回报率可观的庞大市场，而中美之间的交易是基于双方凭各自优劣互惠互利，从而互相合作学习。“说中国没有能力发展自己的科技，完全是由于无知才会有的想法。”他毫不含糊地说，“在这场科技发展较量的竞赛里，指控中国用偷窃手段是低下可耻的。”吴尔夫教授举李约瑟的研究工程为实例，针对这种无知做出最雄辩的回应。

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在世界学术界是个蜚声全球的响亮名字，被尊为英国汉学界泰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著述兼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属于空前重量级的巨著，共分7卷28册，曾当选为20世纪100部最佳非小说类作品，一般人对他纠正西方长久以来对中国的偏见与无知所作出的贡献，却不甚了了。这也难怪，整套书因所涵盖的内容之广，几乎无所不包，论述之深度涉及东西方科学思想和理论的分析比较，绝非一般读者会去涉猎的。尽管这套巨著出版之后，曾有科林·若南（Colin Ronan）编纂浓缩版共6册（1978-2004），另有罗拔·邓波儿



李约瑟近照

（Robert Temple）所著《天才中国：科学与发现与发明三千年》（The Genius of China: 3000 Years of Science, Discovery and Invention, 1998出版），将李氏巨著的内容做了扼要的简介，“中国传统科学对现代科技的影响”毕竟还是个专门的学术课题，而且，对许多人来说，两者也许是互不相干的事，更别提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了。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说：中国“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一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但是在16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时，“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从此落后于西方。为何如此？这也是他这项研究工作要尽力去探讨的重大问题，一般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大哉问”。尽管这“难题”至今还未获得完满的解答，李约瑟觉得肯定的是：中国许多古代科学的发明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巨大

的影响和贡献。

其实，李约瑟费尽半辈子心血，用和西方对比的方式钻研与书写中国科技史，为的是要以这套书当作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促进对话沟通，消除欧美许多人因傲慢与偏见而造成对于东方的无知及优越感。他学术上的研究议题加上他本人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数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的参与合作，历年研究过程中所累积的文献资料与成果集中一处，形成了座落在剑桥大学里的“李氏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好让中国以及东亚科技史成为永久性的专门学术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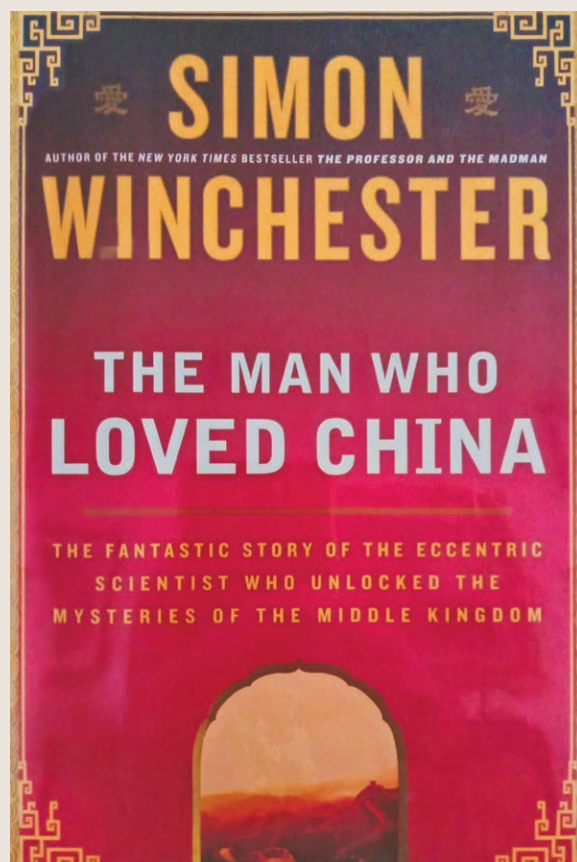
李约瑟37岁之前原是一位卓越有成的科学家，专攻化学生物，后来，在一些中国科学家的影响下，对中国科学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便下定决心学中文。从一个汉字都不认识起，到能够博览中国古代典籍里的原始资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至于要深入了解个中文、史、哲的内容，进而应用到科技史的论述上，对一位颇迟起步的学者来说，所必须克服的各种障碍，确是一般人无法想象到的。这项研究工程开始的几册全由李氏亲自书写而成，后来篇幅越来越多，他才得到各国学者的协助与合作，试想这是个多么惊人的难度，是何等庞大的工作量？他1948年着手写《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年出版第一卷，直至1995年他逝世后编纂工作还继续进行，陆续出版了八册。

为了完成与延续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工作，他也曾常经历过经费短缺的时候。当年访问新加坡时，除讲学外，目的是要为创建李约瑟研究所筹款，结果获得华侨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振传博士（1908-2005）认捐新币90万元，作为建研究所里“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费用。

李约瑟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启发了著名英国作家西门·温契斯特（Simon Winchester）写成一部广获好评的传记《爱上中国的人》（The Man Who Loved China, 2008，中文版译者潘震）。传记里穿插了许多一般记录里缺乏的富于戏剧性的情节与内容，让人读起来趣味横生。作者利用了大量未曾发表过的文献记录如

日记、信札与访谈资料，以生花妙笔叙述了这位杰出剑桥学者对中国文化执着、坚贞不渝的爱恋，也穿插着他与红颜知己的中国科学家鲁桂珍之间不寻常的恋情。在这段诞生于剑桥大学关于中国科技的世纪传奇里，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始终是这位自南京来英国留学的女子鲁桂珍。根据当年跟她访谈所追溯：李氏后半生对中国语文、文化和科学的兴趣，原来是从他俩聊中国人如何数数开始的。

虽然有一部分学者批评李氏过度夸张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对西方的影响，学术界一般上对他的研究成果与贡献都给予至高的评价与肯定。无论如何，他的学问渊博，治学严谨，加上那股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坚毅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不过，我觉得他那近半个世纪的伟大工程更深远的意义，还是他致力于对“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愿景，所体现出胸襟开放与抱



西门·温契斯特受李约瑟启发写成传记《爱上中国的人》，中文版译者为潘震

Joseph Needham and his love for Chinese culture

负宽宏的人文关怀。

当年李约瑟毅然投入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主要就是为了要沟通东方和西方。他的文集《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Within the Four Seas: The Dialogue of East and West*, 劳陇译, 1969），写道：“科学这种东西只能由全世界人民以最充分的自由方式共同享受。……科学的基石也并不只是欧洲人，而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所共同镌刻和奠定的。”有意思的是，文集题目取自《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

“欧洲文化应该和其他兄弟文化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我们常常听到西方人说，亚洲人只是抄袭了欧洲的知识和技术成就；其含义就是说欧洲人辛辛苦苦创造了一切现代科学的机械设备，而亚洲人只在他们艰苦创业的基础上坐享其成。但是，这种历史观点……是不正确的。学习应用现代技术绝不是简单的模仿，学者必须要懂得它的理论依据。”

李约瑟这番“科技无国界”的话，是1955年说的，听起来却似针对时弊，冲着当今现状，与前面引述吴尔夫教授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说法完全一致。

他在文章结语里说：“我们必须真诚相信，一切种族主义的思想，一切自我陶醉的文化优越感都是和世界大同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那个年代的科技距离今日的太空探测、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实在太遥远了。如今世界科技尽管很先进，但有很多人，尤其是西方的某些政客，所表现的傲慢、与无知不逊于从前。

几个月来，不绝于耳的新闻总是美国对中国的高端移动通信科技无所不用其极地遏制和封杀，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一个被尊为全世界最强民主国家的楷模，竟如此霸凌弱者，以科技当称霸的武器，要如何谈和平共处、世界大同呢？

(作者曾任《海峡时报》双语版主编、好藏之兼吴冠中美术馆馆长)

“Very simple, world solidarity!” said Cambridge schola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when asked why he had spent half his life studying Chinese science after a lecture he had delivered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in 1983. His answer received a thunderous applause.

I remember that even more vividly now as I watch online videos for news on world events feeling grateful that I was present at the talk and had the chance to interview him and his collaborator Lu Gwei Djen as a journalist for The Straits Times 37 years ago.

One video mentioned Needham's remarkable project in a commentary by American economist Richard Wolff on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China's intellectual theft". Trade wars could, Wolff says, lead to military conflicts as history has shown and the repeated notion that China is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develop h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dangerous. He thinks it is offensive and racist to suggest the Chinese people cannot develo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ir own without relying on stealing from the West in general and the US in particular.

Wolff says most technology is transferred and acquired with countries working together in research sharing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He cites Needham's multi-volume publi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to refute the "theft" rhetoric. Needham has pointed out that far from being backward, the Chinese have in the last several thousand years been in the forefront and have develop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y ahead of the West who had to learn from them. Wolff therefore calls allegat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gainst the Chinese shameful being based on total ignorance and bad faith.

Though Needham was a renowned scholar especially for his publi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many may not know how his work debunks the widespread prejudice and ignorance about China's scientific progress. Understandable because his work comprising seven volumes and 28 parts is not for the general reader due to its profound breadth and depth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omparison with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I admire Needham's work particularly for his great humanistic aspirations. He wanted his project to be a brid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promoting dialogue and breaking down prejudice and ignorance.

"Science is something which can only be shared in fullest freedom among all the world's peoples," he writes in a book entitled *Within the Four Seas*, interestingly a line taken from Confucius' *Analects*: all men within the four seas are brothers.

"Europeans must realise today that they should share with their brothers the fruits of all those incalculable benefits ... of modern science," he writes, adding it's wrong to say Asians copied their achievements and enjoyed the groundwork they had laid.

"We need a real conviction that all racialism, all satisfied belief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are a denial of world community," Needham's words in 1955 spoken as though in response to American efforts to thwart China's technological advance by all means.



被高楼环绕的老巴刹是我国国家古迹

独一无二 老巴刹



文图·虎威

被 高楼环绕的老巴刹，从前是湿巴刹，目前是熟食中心。它是我国国家古迹之一，但与其他古迹有很大的差别，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原来，它不仅是我国73个国家古迹中唯一的巴刹建筑；也是唯一以铸铁为结构的建筑。

平面为八角形的建筑

老巴刹也叫直落亚逸巴刹，其起点可追溯至1823年，建于马吉街西部一座用木材和亚答建成的建筑。马吉乃英语Market的音译，意思是市场，所指的便是这座巴刹。而巴刹是马来语Pasar的音译，意思相同。

由于建得不够稳固，这第一座直落亚逸巴刹在1833年被另一座由新加坡开埠初期著名建筑师哥里门所设计的砖瓦建筑取代。旧图片显示第二座直落亚逸巴刹平面呈八角形，而且竖立在海边。因填土计划它于1879年也被拆除。1894年，另一簇新建筑物在附近地段出现：同样有八角型平面，但比以前更有气派，

并以铸铁和瓦建造，这就是一直留存至今的老巴刹。

多年来，直落亚逸巴刹的用途是菜市场，有个时期据说内有双层，上层卖菜，下层卖熟食。到了1989年正式命名老巴刹，翻新后一度以节日市场形式出现。2014年又经另一轮装修。

铸铁构件源自苏格兰

老巴刹诞生的年代，是西方建筑界盛行用铸铁作为结构构件的年代。什么是铸铁呢？它是含百分之二至四的碳，以及硅、锰等元素的铁合金，并以熔化的形式倒入模中制作各种产品。早在公元前6世纪已在中国使用，并在14世纪开始出现在欧洲。自18世纪它逐渐被用于桥梁和建筑结构构件。1851年伦敦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上，一座巨型的，以预制铸铁构件和玻璃建造的“水晶宫”使世人惊艳。其后数年的一些国际博览会都以这种结构做展馆，园林里的大温室也以相同方式建造。

老巴刹由詹姆士·麦里芝设计。这位在1883年至1895年任新加坡市政工程师的英国人，曾负责多个项目，包括旧哥里门桥、扩展麦里芝蓄水池——此蓄水池于1922年以他命名。老巴刹的设计无论在尺度上、造型上，都不逊于刚才提到的一些铸铁建筑范例，但自有其独特性。它四面，不，八面通风，且不以玻璃而以瓦片盖顶，与狮城热带气候配合。其神来之笔乃是在八角形平面的中心，建筑顶部，添一平面呈正方形的铁塔，且塔的每一面皆有个时钟！

老巴刹的铸铁构件源自苏格兰一著名铸造厂，运到狮城才组装。因有此特性，1890年代当要建地铁隧道时，可将它完全拆除，直至地铁完工后重新组合，完好无损。

从“新市场”来到“旧市场”

我从小就知道有老巴刹这么一座特殊的老建筑，与它关系变得密切却是在跨国房地产集团任职的那段岁月里。加入此集团在14年前，当时，隶属的是个叫New Market的单位，顾名思义是开拓海外“新市场”的单位。办公室在安顺路，离老巴刹不远，却没到那儿去。常因公务出差，在办公室的日子确实也不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集团作出一些重组，New Market忽然解散，我和一些同事们被调任。新办公室在罗敏申路上，从窗口往下望即见到老巴刹。有人开玩笑：这岂不是从“新市场”来到“旧市场”？“旧市场”即老巴刹也。

近水楼台，在这段日子里我常到老巴刹吃午餐。午餐时段此处人潮汹涌，如果是个大热天，定会吃得大汗淋漓。有个云吞面摊我最喜光顾，由一对上了年纪，口操粤语的姐妹掌摊。其云吞面古早味十足，是稀有的地道美食。一日如常排队，其中一位阿婶对我说：“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开档，老了不做了！”一切来得突然，可叹古早味云吞面此后无迹可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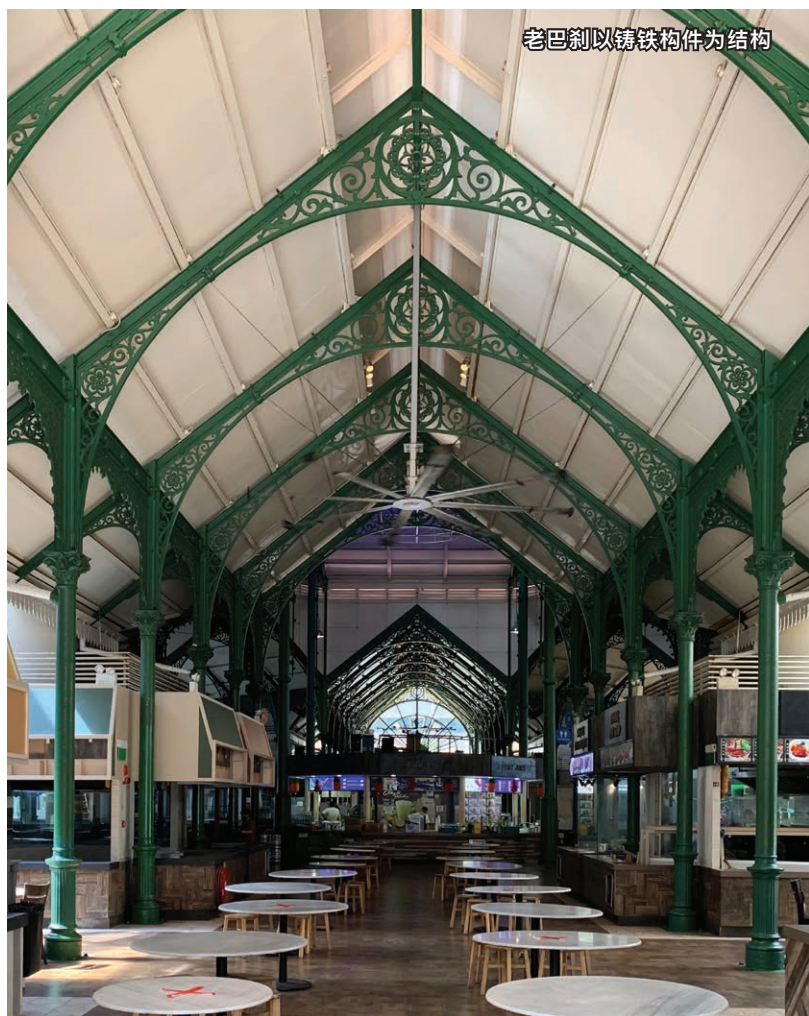
老巴刹四面环街，其中一条是文达街。每到黄昏这条街不准车辆进入，变成摆满桌椅的沙爹街。印象中，当年红极一时，位于康乐亭的“沙爹俱乐部”停业和拆除后，这条沙爹街是它的代替品。我和家人曾到过几次，那要比我与老巴刹为邻的日子还要早好些年。

对老巴刹未来的期望

老巴刹是座十分漂亮的老建筑。它的铸铁构件——无论柱子的柱冠、柱础或是半圆拱的细节，都十分精细，甚至可用“华美”来形容。它内部的空间，尤其是钟塔下高耸的空间，更有股动人的气势。

个人觉得，目前老巴刹作为熟食中心（无异于任何熟食中心）的功能，尚未让建筑呈现它最好的一面。这华美的结构也许一开始就与市井的菜市场有段距离。它依然用来作为买卖（目前是食物的买卖）的场所值得肯定，然而，这不是唯一的模式。也许我们可运用“从农场到餐桌”的概念、观照铸铁建筑在全盛时期与园林的密切关系、思考“可持续性”的发展要求，以这三方面为考量，发挥创意，将它打造成集高科技耕作、农产品销售、室内园林餐饮于一炉的，绿意盎然的绿色建筑，那么，它的未来应将是更美好的。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经前紧张综合征

的调理



文图 · 李曰琳

女性在月经前7-14天，出现头痛、乳房胀痛、全身乏力、紧张、压抑或易怒、烦躁、失眠、腹痛、水肿等一系列症状。月经来过以后，症状自然消失，称为经前紧张综合征（premenstrual tension syndrome, PMS）。大多数女性表现轻度经前紧张综合征，少数表现精神症状及性格行为改变，严重者会影响生活和工作。

目前普遍认为经前期激素波动是经前紧张综合征的主要原因。另外丘脑下部-垂体-卵巢-子宫轴调节功能紊乱，影响神经内分泌变化；某些维生素缺乏都与经前紧张综合征有一定关系。压力和抑郁的程度也会进一步加重症状。

中医将经前紧张综合征按照出现的症状，详细地分为经行发热、经行头痛、经行眩晕、经行身痛、经行泄泻、经行吐衄、经行浮肿、经行乳房胀痛、经行情志异常、经行口米、经行风疹块等一系列病症，并针对每一病症的各种不同表现进行辨证分型，根据不同体质不同证型进行施治。如：头痛，根据辨证可以分为气血虚弱、阴虚阳亢、瘀血阻滞、痰湿中阻四型，根据患者的症状，或益气补血，或滋阴潜阳，或活血化瘀，或燥湿通络，具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

这里针对几个临床常见的经前紧张综合征症状，介绍一下中医的治疗方法。

经行头痛

每到月经期或经行前后，出现明显的头痛，严重者剧痛难忍，甚至呕吐。经行头痛有虚实之分，大多痛于经前或经期，多胀痛或刺痛的为实证；多在经后或行经将净时头晕隐痛，多为虚症。中医以调理气血为主，使气顺血和，清窍得养，则头痛自止。

1.血虚头痛：经期或经后头晕头痛，心悸少

寐，神疲乏力，舌淡苔薄，脉虚细。

治法：养血益气。

方药：八珍汤加减，用当归、川芎、白芍、熟地、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枸杞、首乌等滋阴养血。

中药也可以同时配合针灸穴位：如关元、气海、足三里、中极等温养冲任，调补气血。

2.肝火头痛：经行头痛，或巅顶掣痛，头晕目眩，烦躁易怒，口苦咽干，舌质红，苔薄黄，脉弦细数。

治法：养阴清热，柔肝熄风。

方药：杞菊地黄丸加减，用熟地、山萸肉、山药、泽泻、丹皮、茯苓、枸杞、菊花、夏枯草、白蒺藜等平肝熄风。

同时可以配合针灸穴位：如太冲、太溪、百会、风池、三阴交等平肝潜阳，滋水涵木。

3.血瘀头痛：每到经前、经期头痛剧烈，经色紫黯有血块，伴有小腹疼痛，舌黯或有瘀点，脉细涩。

治法：调气活血，化瘀通络。

方药：通窍活血汤加减，用赤芍、川芎、桃仁、红花、老葱、麝香、生姜、大枣等化瘀止痛。

同时配合针灸穴位：如合谷、血海、三阴交、太阳穴、阿是穴等活血化瘀，行气止痛。

经行泄泻

每值行经前后或经期，大便溏薄，或清稀如水，一日数次，称为经行泄泻。若大便稀薄，脘腹胀满，多为脾虚；若大便清稀如水，天亮前而泻，畏寒肢冷，多为肾气虚寒所致。中医治疗以健脾温肾为主。

1.脾虚泄泻：经前或经期，大便溏泄，脘腹胀满，神疲肢软，面浮肢肿，经量多，色淡质

薄，舌淡红苔白，脉濡缓。

治法：健脾益气，化湿调经。

方药：参苓白术散加减，用人参、白术、茯苓、扁豆、甘草、山药、桔梗、薏苡仁、砂仁等健脾化湿止泻。

2. 肾虚泄泻：经行或经后，大便泄泻，腰膝酸软，头昏耳鸣，畏寒肢冷，经色淡，质清稀，舌淡苔白，脉沉迟。

治法：温肾扶阳，暖土固肠。

方药：健固汤合四神丸加减，用党参、白术、茯苓、薏苡仁、巴戟天、补骨脂、吴茱萸、肉豆蔻、五味子等温肾健脾，固涩止泻。

经行泄泻还可以配合艾灸穴位，如脾腧、肾腧、天枢、足三里、三阴交加强健脾温肾止泻的效果。

因症状和分型较多，以下针对一些常见经行紧张综合征的症状，推荐一些食疗方法，帮助舒缓一些经前紧张综合征症状。请对症使用，若不能辨别自己的体质特点，请在使用前咨询中医师，以便对症下药。

食疗方法

蔓荆子菊花茶



材料：蔓荆子3g、杭白菊3g、枸杞3g、冰糖3g、泡茶饮。

功效：平肝潜阳，疏风止痛。适合经前或经期阳头痛，烦躁易怒的阳亢型经行头痛。

桂圆紫米粥

材料：桂圆、红豆、红枣、薏米、莲

子、银耳、陈皮适量、加黑糖熬粥。

功效：益气养血，调经止晕。适合经前或经后气血亏虚型经行眩晕。

健脾止泻粥

材料：淮山30g、芡实15g、茯苓15g、粳米50g，加水熬粥。

功效：健脾益气，除湿止泻。适合经前或经期大便溏泻、脘腹胀满、神疲、经量多而色淡的脾气虚型经行泄泻。

三花茶

材料：佛手6g、绿梅花10个、玫瑰花15个、冰糖适量，泡茶饮。

功效：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适合经前乳房胀痛，胸胁胀满的气滞型的经行乳房胀痛。

姜黄奶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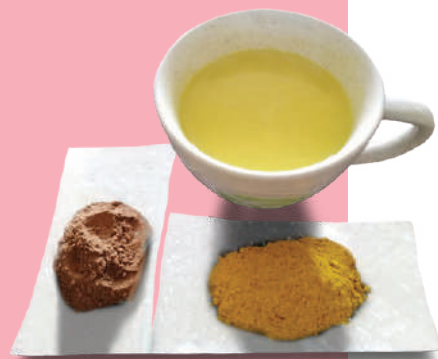
材料：姜黄1茶匙、肉桂粉1/2茶匙、牛奶200ml、一起煮滚后过滤，加入1茶匙蜂蜜即可当茶饮。

功效：活血化瘀，通经止痛。适合经期肢体疼痛、屈伸不利、少腹坠胀的血瘀型经行身痛。

甘麦大枣汤

材料：浮小麦6g、大枣5颗、甘草6g、加500ml水煮成茶饮。

功效：补血安神定志。适合经前或经期精神抑郁、烦躁、失眠的心血不足的经行情志异常。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他手上那支笔

林琼专访



文·齐亚蓉
图·受访者提供

宠儿金拉

1930年8月31日，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第二大市镇瓜拉庇劳（山城），位于邓恩街225号的一栋双层排屋里，一声婴孩的啼哭划破了夜空。

“恭喜！恭喜！男孩子，男孩子啊！”笑逐颜开的接生婆边报喜边忙不迭地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婴孩递到了等在门外的父亲林光挺手里。年过半百的父亲热泪盈眶，他连忙走到夫人辜氏文卯身边，俯下身来轻轻说了声：“辛苦你了！”

可不是吗？自从长子金沙出世后，接下来一连四个都是女孩，为了多一个男丁，这位求子心切的人父只好花钱买了个男孩，是为次子金泰，这个迟来的幼子可真是上天的恩赐啊！

他为怀里的婴孩取名金拉。

自福建永春捕头村南来的林光挺精明能干，白手起家的他如今已是遐迩闻名的侨领，身兼多个团体的要职，且深受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莫哈末器重，被任命为“挂沙人”，拥有代表签署皇室某些文件的至高权力，同时拥有严端封赐的“宝星”勋章。

富甲一方且地位显赫的林光挺视钱财为身外物，认为钱财“为散而聚”，为国散财乃情理之中，他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出钱出力办教育、做慈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惠及一方，功不可没。他还是同盟会会员，出钱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被封二等“嘉禾”奖章。

幼年失学的他对于孩子的教育自然十分重视，夫妻俩自小即对儿女严加管教，督促他们用

心向学，将来服务社会。

但对于幼子金拉，他们却怎么也硬不下心来，加上哥哥姐姐们的宠爱，衣食无忧的金拉由着性子自由自在地玩耍：玩陀螺、打石子、放风筝、斗蝇虎、踢毽子、下河摸鱼、上树掏鸟……不想上学，不想读书，只想玩乐。

年幼两岁的芳邻珠子是他最为喜爱的玩伴，直到珠子入学那年，金拉才跟着她一起走进了镇上的中华小学。

求学时代

入学后的金拉跟珠子形影不离，他们同窗又同桌，就连做功课也是珠联璧合。美丽又聪明的珠子是金拉的榜样，他们课堂上一起学习，课后一起温习，但成绩上珠子总是排在金拉前面。

“她第一，我第三。”忆起这段两小无猜的日子，金拉的心头满是幸福和甜蜜。

虽然入学较晚，但金拉的起点并不低，因为早在稚童岁月，母亲就教过他一些童谣，算是最早的文学启蒙吧。

读书识字后，他开始喜爱上《儿童乐园》、《世界儿童》等刊物，也慢慢对写作产生了兴趣。在一次作文比赛中，他获得了第一名，由此萌生了投稿的念头。其时正值日治时期，疼爱他的三叔惨遭日本人杀害，他追忆三叔的习作《月下追忆》发表于《马来亚少年报》第39期，时间是1948年8月20日。

此时的他已被四姐带到了古城马六甲，就读于培风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同样爱好写作的寒梅和秋枫（原名陈鸿敏），他们不时投稿报刊，被同学们戏称“三剑客”。而他心爱的珠子则去了森州首府芙蓉念高中师范学校。此时的金拉跟孩童时期已全然不同，他的父亲病逝多年（1941年），当家的大哥金沙所经营的树胶生意一落千丈，父亲留下的基业赔得一干二净，万千宠爱集一身的金拉已跟平民子弟无异，区区几块钱的稿费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惊喜。

来到古城，他陆续接触到了巴金、冰心、朱自清、许地山、鲁迅等名家的著作，课余时间从来手不释卷，如饥似渴。

初中毕业后，来自狮城的郑秀民老师把他带到了中正湖畔，由于中学毕业成绩特出，他获准免考，直接进了高中。

寄宿“蒙古包”（中正中学第八学生宿舍）的金拉被浓浓的文艺气氛包围着——他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爱好者，在他们的鼓励及影响下，他更加疯狂地爱上了文学创作，一篇篇满怀激情的文稿变成了铅字。檳城钟灵中学的《学报》月刊、中华中学的《学艺》月刊，巴生兴华中学的《兴文》月刊、马六甲培风中学的《新苗》月刊、《星洲日报》的“学生园地”、《南洋商报》的“学海”副刊等，都成了他笔耕的乐园。

1952年，也就是他上高三那年，《南方晚报》社出版了一本南方晚报散文选，书名《火之恋》，用的就是金拉发表于该报的一篇散文的标题，他的另一篇散文《人类的春天》也入选。这两篇散文后来都收在他的散文集《永恒的记忆》里。

高中毕业后，因经济原因，金拉没能进入大学，他回到了古城马六甲，在那里，他跟高师毕业的珠子一起执教于培风第三小学。两年后，金拉再次南下狮城，进入教育学院全日制文凭进修班（两年）。毕业后，珠子随他一起南来，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小学任教，并订下了婚约。

珠子也是一位写作爱好者（笔名刘萍），无论在山城、古城还是狮城，他们一直用手中的笔互通款曲，可谓志趣相投，琴瑟和鸣。四年后，他们在锡山脚下的一座半独立式洋房（仙端巷51号）筑起了爱巢。喜结连理后，金拉跟以前一样，教书、写作两不误，珠子工余则集中精力



于相夫教子，但她始终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也会直言不讳提出自己的意见。

婚后，金拉在妻子的支持下利用工余时间进入义安学院修读文学课程，并获取了学士学位。

琼花绽放

金拉有好几个笔名：王朱、林诗天、林锦劳，用得最多、最久的当为林琼，因为他独爱夜间绽放的琼花（昙花的别称），他永远忘不了小时候跟家人彻夜等待琼花开放的情景，那洁白如玉的月下美人总是令他感动莫名。

琼花美得令人惊叹，但短短的三四个小时后即香消玉殒，而林琼——注定要成为一朵不败的琼花，那扑鼻的清香，注定要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手中的笔，提起来后，就从来没有停歇的时候。杂谈、散文、诗歌（包括童诗）、小说、评论，一篇接一篇出现在各类报刊、杂志上，他把每一篇发表的作品都按时间顺序剪贴在一起，是为“林琼存稿簿”，计有33本，这些存稿目前都已集结成书。

1967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教学杂谈》问世，第二年又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永恒的记忆》及一本诗集《并蒂莲》。

截止2019年8月，林琼共出版散文集13本、童诗集5本、微型小说集两本、诗集三本、评论集10本，总数跟他的“存稿簿”一样，同为33本，用著作甚丰来形容当不为过。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他自1972年起开始撰写文艺评论系列——“文坛拾碎”，这个系列旨在以“人”为出发点，介绍新马华文作者及其作品。这十本评论集按时间先后排序如下：《飞越星空》、《狮城狮声》、《狮岛阳光》、《望园花踪》、《虎乡虎语》、《满园花开》、《星洲河畔》、《错过天空》、《文林追踪》、《世纪风景》，欲知本区域尤其新马两地华文文坛掌故，林琼的评论系列是最好的资料。

同时，他也在编写以“书”为出发点的“文艺寄筒”，这些“寄筒”分别以“文艺通讯”、“香园寄筒”、“棕园寄筒”、“望园寄筒”、“文屋寄筒”、“小窗寄筒”、“山下寄筒”为名发表于各类报刊，先后写了数百篇，篇幅比之拾碎更长。但因时间、精力所限，这一系列至今

尚未能成书，每思于此，耄寿之年的林琼不免心犹凄戚。

结缘锡山

落户狮城后，林琼跟锡山（武吉知马山）的缘分可谓难解难分。

他购得的第一处房产在武吉知马六里半处，这个私人住宅区叫做香港园，林琼叫它香园，他在香园结婚、生子，他的独子义平在这里长大，陪伴义平一起成长的，是屋子前后那两棵红毛丹树，那是他的母亲从瓜拉庇劳带来种下的。儿子结婚后，他们一家搬去了西海岸的棕园，但因为种种不便，几年后又在武吉知马七里处的名望园（望园）购得一公寓单位作为养老之地。

无论昔日的香园还是如今的望园，林琼家里从来没有少过文友，尤其是香园。

最先到访香园的是家住新山的难明（李寿章），后来不少大马文友陆续前来，如麦秀、慧适、草风、杰伦、端木虹、孟沙等。本地文友不招自来更是寻常事，比如莫河，只要驾车路过，定当转入香园一见。而周黎曾携眷前来采红毛丹，咖啡八友之七友（张挥、陈彦、雨青、何必问、民迅、李艺、莫河）在林琼跌断锁骨时曾前来探望。秦淮与烈浦也曾陪同大马文友留影香园。

早年林琼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多年，雨青、陈彦、民迅、李艺、何必问等文友常来香园商讨会务。

香园岁月里，林琼写了很多小品文发表于报端，后来集结成书，是为《香园随笔》。而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几本散文集及诗集（包括童诗集）无不沾满香园的情韵。

晚年住进望园的林琼过起了隐居式生活，他



静下心来把发表于各类报刊杂志的文章整理归类，集结成书，同时把自己收藏的各类书籍慷慨赠予文友，艾禹和君盈绿就曾前往望园探望林琼，同时从他家的书山上挖得很多宝物。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林琼把父亲与孙中山革命事业有关的珍贵资料以及六册《林光挺文献集》捐献给国家图书馆管理局收藏，图书馆已将文献数码化，以方便国内外人士上网参阅。而他自己的《存稿簿》也慷慨惠借给国家图书馆扫描、加工并做简单分类及附加目录，整理成《林琼存稿簿》，按年代顺序分为九册，所收录的作品是研究新马文学史的宝贵资料。

除了写书、出书，林琼跟锡山的另一段缘是锡山文艺。

上世纪80年代初，以知名作家李汝琳为首的一群文学爱好者常常于黄昏时分雅聚于永康私人住宅区内的一家咖啡店——永康餐室，林琼就是其中的一员。后来，在时任武吉知马国会议员王家园博士的倡议下，众文友移步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1990年，锡山文艺中心应运而生，主席团主席几易其主，林琼则一直担任理事至今。

2014年11月，林琼嘱独子林义平汇编了一本心声集——《他手上那支笔》，主要收录了众多文友对林琼及其作品的评价，另有文友的赠诗及留言，后记执笔者为林琼之妻刘萍。

耄耋之年的林琼，依然在笔耕，他手上那支笔，自从提起之后，就没再放下过。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后记

大概两年前，自骆明处初闻林琼之大名，主编遂授意前往采访，并亲自打电话过去希望征得对方同意，但被老先生以年事已高回绝，只得作罢。

四个月前采访过寒川后，他也向我提起了年近九旬的林琼，并表示他们住得很近，他可帮我联系。此时的我早已把老先生不愿接受采访一事忘得一干二净，故决定八月初采访过杜红之后采访林琼。

七月底跟杜红取得了联系，并约定了采访时间，但就在约定时间的前一个星期，杜红的儿子打来电话，说其父患失智症已有一段日子，已不适合接受采访，并要我代为通知广大文友。情急之下只好托寒川尽快联系林琼，寒川亲自前往林家，当日即告知我林琼答应接受采访。正在暗自庆幸，主编打来电话，这才恍然发现自己做了件糊涂事，好在主编告诉我老先生虽然心有疑惑，但还是答应接受采访。

那天提早十分钟来到望园，当我走出电梯之时，看到林家大门敞开，不觉心头一热。

终于见到了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作家，虽年老体弱，不良于行，牙松耳背，但头脑非常清醒，一册册整齐排列的资料，一大摞或新或旧的书册，有这些就足够了。

尽量提高音量，加上手中的笔，提了几个问题，然后由他慢慢道来，他怕我赶时间，我怕他太劳累，前后三个小时左右，收获满满。很是庆幸自己的糊涂，不然真的走宝了。

谈到之前不愿接受采访的缘由，老先生直言怕遭个别文友非议，让人心疼不已，同时也感慨万千：文人相轻何时休？何时休？！

非凡的蜡染画家



杜亚与他的母亲

杜亚



图文·赵宏

提

到本区域内的蜡染艺术，一般人会很自然地想到印尼的日惹，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则可能想到马来西亚的蔡天定，不过，也许还应该记住有可能忽略的一个低调的名字——杜亚。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与传统的蜡染作品非常不同，与其他一些当代蜡染艺术家的作品也大相径庭，是最“不像蜡染的蜡染作品”。除了在上个世纪70年代起曾在世界各地连续多次成功举办个人展览和受邀讲学之外，他的作品也在1994年被国际顶尖拍卖行佳士得公司纳入拍卖会目录，同行艺术家们一时无出其右。

杜亚，英文名Toya，华文名林坤福（Lim Khoon Hock），1943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檳城的亚依淡（Ayer Itam）。他家境贫寒，12岁起在村里的橡胶种植园里做工，挣钱养家并攒学费读书，后毕业于钟灵中学。此后，为维持生计，他先后还在万浓和雪兰莪做过割胶工人。艰苦的劳作令杜亚立誓要跳出龙门，改变人生。

杜亚的内心对艺术一直有着一种神奇的向往，在学校的时候即显露出艺术上的天赋，但据他自己后来公开表示，他并不喜欢上美术课，不愿意听老师教来教去，而是喜欢自己琢磨。他先后自学过水彩、油画和中国水墨，最终选择了蜡染，在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专门向马来西亚著名蜡染艺术家蔡天定学习之后，决定开始自己的创作。他曾说，他的人生从20岁开始。

蜡染是一种古老的染色术，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叫做Batik，在日本称为蜡缬染。根据出土文物和有据可查的历史纪录，印度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有从草本植物中提取靛蓝印染棉织品的记录，因此棉织品的印染术很可能是发源于印度，从出土的蜡染棉织物可以佐证印度曾拥有高度发达的蜡染文化。中国的蜡染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即大约2000年前后，多为苗人所作。隋唐时代的宫廷似乎对这种手工艺品尤其钟爱，日本就是在这个时期引进蜡染的。至于印尼，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最早记录蜡染实物出现的时间是1677年，未经证实的记录甚至更早，可能在12世纪与埃及的商品贸易中就已经有蜡染制品了。南美、西非、以及泰国北部，还有中部苏拉维西等地似乎也有零星的记载，这些或多或少与早期的印度文化以及明代郑和船队的中华文化影响有关，但仍需要历史学者考证才能下结论。荷兰殖民者将印尼的蜡染制品和技术介绍到欧洲，称为蜡防印花工艺，英国和德国甚至有专门的工厂进行工业化生产。

但杜亚追求的不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蜡染作品，这些传统的蜡染作品通常只是被当作手工艺品，是用来装饰和实用的，杜亚是要把蜡染提升为纯艺术的境界，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当他有机会看到法国印象派大师的作品，如乔治·修拉（1859-1891）、保罗·希涅克（1863-1935）和卡米耶·毕沙罗（1830-1903），杜亚立下雄



蜡染作品《田间劳作的女人》（1998）



蜡染作品《收集干草》（1975）

心，要用蜡染创作具有同样光影效果和明暗效果的作品，而不是通常所见的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法的蜡染。他要去掉线条，看到“不像蜡染”的艺术效果，把和工匠划等号的手工艺发展成真正意义的纯美术范畴的高尚艺术品。

蜡染的创作工具，在中国贵州地区，主要是用一种斧子形状的、中空的小型钢质刀具，将蜡熔化后滴在布上。印尼则使用一种锡制的小壶，有细长的尖嘴和长长的竹制手把。在越南，据说用小巧的竹刀沾上熔化的蜡液。为了保证蜡液的自由流动，需要不时用炉火加热。当熔化的蜡滴在布上之后，就可以印染了。以前都是使用靛蓝，是用野生植物榨出的汁液经处理后形成的一种深蓝色，后来慢慢的也有人尝试红色、赭黄和黑色等颜色，但基本上都是单色的，也可以由浅至深，层层印染。有蜡的地方就是白色，没有蜡的地方就可以染色，用温水洗掉蜡之后，还可以再滴蜡，再染，从而形成多种颜色和图案的叠加。杜亚在材料和工具上都有创新，形成他自己的独特技艺和表现手法。据说他在蜡里加上了菜油，有时也使用毛笔以达到某种特殊的效果。

杜亚回到故乡，在远离城市和喧嚣的乡村，在他喜欢的林木葱郁的田园诗般的大自然中，安静地探索，尝试和创作。没有人知道这里住着一位心怀梦想的艺术家的，他的门都不需要上锁，连小偷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人居住。功夫不负有心人，27岁的时候，杜亚在曼谷举办了他的第一次个人展览，为期一周，引起轰动。

杜亚的作品很快引起了国际艺术界的关注。他一边创作，一边在世界各地巡回举办个人展

览，也接受很多大学的邀请，发表学术演讲和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他独特的创作理念和技巧，使他成为蜡染革命的第一人，也是最成功的一个。西方学者曾撰文说，杜亚的蜡染作品是唯一的，在他之后，很难会有第二个人，他是不可复制的。

杜亚的作品大多采用以黄色为主基调，层次繁杂，色彩变化随光线变化，一般人第一眼都可能会误认为是油画作品。他热爱自然，作品以表现热带的甘榜风情为主：劳作的乡村妇女、可爱的儿童、牛只、草棚，体现的是祥和安静的气息，唯美自然。由于蜡染特有的繁琐技术，杜亚的创作速度很慢，一年至多只有8-10幅作品问世，因此他的作品售价也远远高出一般的蜡染手工艺品。不少喜欢收藏的艺术赞助人，尤其是来自西方的洋人，宁愿长时间等待。有些国家级的美术馆也以收藏杜亚作品为荣。

2006年，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为杜亚举办了个人展览，在本地引起轰动。几年后，杜亚在马来西亚去世。就在他过世前一个月，杜亚在新加坡的朋友还给他汇钱，资助他的生活和创作。

参考文献：

- [1] *Idyllic Canting, Toya's Batik Art*, 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 ISBN 981-05-5744-2.
- [2] *International Batik Artist Toya Retrospective*, The Art Gallery Penang.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杜亚蜡染作品见封底）

读词典

逛京城



文·汪惠迪
图·上教社

品京味儿

我 在新加坡从事华语文工作16年，如果有人问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新加坡人有超强的语言能力，新加坡好像一所语言学院。

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新加坡习称淡米尔话）和英语四种。华语（Mandarin）是“新加坡华族的共同语”。共同语之外，还有几种主要方言：福建话（新加坡习称，即闽南话）、福州话、潮州话、客家话、广东话、海南话。这几种语言集中在一个幅员724.4平方公里、人口564万的蕞尔城市岛国里，相互接触与碰撞，彼此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为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自1979年以来，新加坡一直坚持推广华语。现在，17到39岁之间的新加坡华裔年轻一代，80%能流利地讲华语了。在地球村里，“华语”一词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使用频率不断提高，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变化，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2010年5月）的“前言”和《全球华语大词典》（2016年4月）的“序”将华语定义为“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不过，《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7版，2016年9月）对“华语”的解释依然是“指汉语”；《现代汉语应用规范词典》（2019年1月）的释义是“中国话，多用于境外华人对汉语的称谓”。

在客居新加坡的岁月里，我结识了好几位华语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或播音员，也结识了好几位话剧界与相声界的朋友，他们的华语讲得都挺标准。有一次与程茂德先生聊天儿，他一开

口，我就冒昧地问他祖籍是不是北京，因为他讲的华语与众不同，带京腔，有浓郁的京味儿。程先生回答说，他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这一口带京腔的华语全是靠模仿学来的。语音，口耳之学，靠模仿是可以习得的。

我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在香港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从北京移居香港的汉语教师，他们的普通话讲得很标准，有的就跟程茂德先生一样，一口京腔。在香港，居然有人愿付高额学费，特请这样的老师个别教授普通话。我的一位同事是厦门人，讲得一口京腔普通话，挺受学员欢迎。这两件事儿让我看到了京腔普通话在境外和海外的市场价值。

普通话只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它不是北京话，北京话跟上海话、福建话、广东话一样是方言。我在早报工作时的同事陈伯汉先生是上世纪50年代华侨中学的学生、话剧圈的活跃分子，一口北京腔标准华语说得挺溜的，曾被北京籍的历史老师误认为同乡。

伯汉兄回忆说，1959年自治伊始，新加坡广播电台在维多利亚剧院举办综艺演出，他跟朋友曾鹏翔受邀参与其盛。演出那天，首任总理李光耀是座上嘉宾，休息时到后台跟艺人一一握手，走到曾鹏翔面前时对他说：“你的华语很好听。”当时，曾鹏翔表演的是诗歌朗诵，用的就是“北京腔标准华语”。后来，他凭那口漂亮的华语，在广播界大放异彩十几年。

伯汉兄说，当年用“北京腔”形容华语，不过是借以标榜华语的“漂亮”，为突出标准华语的魅力提供一个参照点。讲究“漂亮华语”在196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蔚然成风，在同侪

中，似乎只有程茂德始终坚持北京腔，不论什么场合都不肯“放低身段”（详参陈伯汉《新加坡的标准华语》和《新加坡的漂亮华语》，2014年5月19日和6月9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拜读伯汉兄写的这两篇回忆文章后，我脑海中油然浮起一串问题：新加坡人为什么要借“北京腔”标榜华语的“漂亮”呢？为什么连李光耀都觉得曾鹏翔的北京腔华语很好听呢？程茂德先生又为什么那么执着，始终坚持北京腔，不论什么场合都不肯“放低身段”呢？我想，原因之一是北京话比普通话更生活化，更口语化，更接地气，更贴近大众。北京话的儿化音现象比普通话多，语言因而显得绵软、动听。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为躲避新冠疫情，远离群魔乱舞、暗淡失色的“东方之珠”，我一溜烟儿似的回到内地江南老家，宅在家里喝茶，读书，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倒也舒坦。忽一日，看到微信公众号上一则书讯：《北京话儿化词典》（增订本，以下简称“增订本”）出版。随即网购一册，次日书到，开卷阅读。

说起“读”词典，不禁怀念起新加坡华文界的前辈学者卢绍昌先生来。我与卢先生相识于香港，熟稔于新加坡，他曾对我说过，有空就读《现代汉语词典》。以前我总以为词典是供“查”的，不是拿来“读”的，退休后不忙着“搵食”，闲云野鹤似的，有的是时间，于是就学卢先生读词典了。

“增订本”收录北京话中的儿化词语7400条，“它们绝大部分还活跃在今天的口语或书面语中”，而条目所用书证都选自“充满京腔、京味儿、京韵，又京范儿十足的佳作”，并随文注明出处。从18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的《红楼梦》到2017年3月出版的《北京话》，共计77种书刊，另有“其他主要参考书目”17种，总共94种之多；其中新加坡人熟悉的老舍的著作最多，共15种。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前副所长张伯江先生在为这部词典所写的“序”中说：“北京话儿化现象的语言学价值，在这部词典丰富的实例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我读“增订本”，还深深地感受到它彰显了北京话儿化现象的文化价值。“增订本”有意增收一些体现北京民俗、风土人情、独门手艺、著名街景、景区、城池的词语，我特喜欢读这些条目。比如我们常在媒体上听到或看到“四九城

儿”，只知道那是北京城的代称，不知道它的来历。“增订本”告诉我们，它泛指当年北京城的布局。旧时，北京有内城、外城之分，内城分东、西、南、北四个城区，共有九座城门：朝阳门（齐化门）、崇文门（哈德门）、正阳门（前门）、宣武门（顺治门）、阜成门（平则门）、德胜门（健德门）、安定门（安贞门）、东直门（崇仁门）、西直门（和义门），统称“四九城儿”。有趣儿的是每个城门各司其职，譬如正阳门走龙车（皇帝每年出此门到天坛祭天，到先农坛耕地），宣武门走囚车（犯人押往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处斩），德胜门走兵车（出城），安定门走兵车（回城）。再如“燕京八景儿”，这是老北京著名的八处景点，即太液秋风（在中南海）、琼岛春阴（在北海公园）、蓊门烟树（在西土城）、卢沟晓月（在卢沟桥）、金台夕照（在金台路）、西山晴雪（在香山）、玉泉趵突（在玉泉山）、居庸叠翠（在居庸关）。

俏皮话儿是“指活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幽默、生动、活泼的话语”，它简洁、形象、幽默、风趣，饱含风土人情、富有生活哲理，“是人们多少年积淀下来的”，不失为我们了解北京俗文化的一个窗口儿。

北京话里的俏皮话儿十分丰富，是北京话的一大特色。限于篇幅，仅举一例说说。比如“嗝儿”，俗指死，含诙谐或不尊重意，常常是小孩儿口中说的粗俗的戏谑语。同义的还有“嗝儿踹”“嗝儿了”“嗝儿凉凉了”“嗝儿屁”及“嗝儿屁啷当”“嗝儿屁着凉”“嗝儿屁着凉大海棠”等。周有光先生就写过一篇讲“嗝儿”的语文小品。

话说中国“文革”期间，1971年9月13日，林彪连夜乘专机仓皇出逃，不料飞机失事，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上人员全部暴尸于异国荒野。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随行的一个会讲华语的记者拿着红皮袖珍本《毛泽东语录》，指着林彪的照片问一个胡同里的小孩儿：“他到哪里去了？”小孩儿回答说：“嗝儿了。”老外听不懂，再问：“什么？”小孩儿：“嗝儿屁了。”老外三问：“什么？”小孩儿：“嗝儿屁着凉了。”老外四问：“什么？”小孩儿：“嗝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记者十分无奈，“啊”地叹了口气，原来他始终没有听懂。当时，京城的小孩儿都知道林彪是个大坏蛋，摔死了，所以用一连串的戏谑语来回答记者的问题，

谁知对牛弹琴，听得老外一头雾水，好不尴尬。他如“赔本儿赚吆喝”、“响鼓不用重槌儿”、“缩脖儿坛子”（形容身材矮小、颈项短的人）、“听蝓蝓儿叫唤去了”（借指人死了，蝓蝓儿即蟋蟀），运用了鲜活生动高超的修辞手法。像这样的俏皮话儿，“增订本”增补了不少。读这些词条，觉得挺有趣儿。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形成于公元1840-1860年间，1917年始进入鼎盛期，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了。京剧在北京扎根、生辉，深受北京人喜爱。“增订本”增收了“范儿”，这个词源于戏曲表演，原指演员在舞台上表现出的一种从容自若、信心十足、精神饱满的状态，引申为“风格、做派、气派”之意。近年来，在中国的媒体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新“范儿”，如“京范儿”“北京范儿”“中国范儿”“国际范儿”“民族范儿”“文化范儿”“文艺范儿”“时尚范儿”“君子范儿”“淑女范儿”“倍儿有范儿”等等。说得文雅一点，“范儿”就是“风范”（风度与气派）。“范儿”都蕴蓄着正能量，是个褒义词儿。

如前所述，在香港和新加坡都有人对京味儿情有独钟，“增订本”富有浓郁的“京味儿”。那究竟什么是“京味儿”？如何理解“京味儿”？这还真是个问号儿。作者告诉我们：“京味儿”不仅仅是形象、生动、丰富的北京话特有的语音、语调，也不仅仅是儿化词语，它体现的是一种有着丰富历史传承的、厚重的北京方言文化，是立体的、全方位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增订本”作者贾采珠是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从小生活在北京城，对北京话，特别是其中的儿化词比较熟悉，对研究儿化词怀有浓厚的兴趣。1990年，她编著的《北京话儿化词典》在北京出版；2019年，“增订本”在上海出版。初版和“增订本”倾注了她几十年的心血。

“增订本”一典在手，笔者想读就读，想查就查，忽前忽后，随心所欲。读着读着，浮想联翩，1958年我初到北京，那会儿正当年轻，好奇心很强。到王府井溜达，听马路上的交警、百货大楼里的售货员、饭庄里的服务员和公车上的售票员讲北京话，自觉十分过瘾。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猫在家里读词典，好似又到北京了，正在逛京城，品京味儿，瘾头儿又上来了。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文·俞盈

葬

暑 假，是雁子最期待，也最不期待的日子。

期待，是因为暑假意味着可以天天在家玩耍，除了作业外，再无任何与学习相关的事；不期待，则是因为每年的暑假，雁子的奶奶就会从遥远的家乡小镇风尘仆仆赶来，探望在外打拼的雁子一家。

“奶奶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雁子却丝毫不觉得高兴。在她看来，奶奶的前来，简直就像是一场一年一度的外敌入侵，而她，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要缴械投降。

雁子不喜欢她的奶奶，一点也不喜欢。不是因为奶奶每次老是要挤着和她睡在一起，也不是因为奶奶厨艺不精还老喜欢煮饭给她吃，并美名其曰有营养——若单单只是这些原因，她倒还可以忍受。但究其根本，是因为每年奶奶一来，雁子的妈妈就会变得异常敏感易怒。在雁子的印象里，父母一大半的争吵，都集中在暑假，这个只占一年的六分之一的日子里。

“你能不能说说你妈，买菜不要总是捡着便宜的买。你自己尝尝她买的鸡肉，连鸡腿吃起来都是木的，难吃得要命，还总是让孩子吃。”晚上，等奶奶睡着之后，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的雁子总会听见妈妈这样和父亲抱怨。

“她老人家就是这样爱捡便宜，你又不是不知道……”爸爸无奈的声音紧接着传出来。不

用想，雁子都知道此刻父亲会不知所措地挠头。

“那你说说她呀！家里本来也不太宽裕，钱哪里是这样浪费的？！”说这话时，妈妈的声音会比往常高八度，听起来有些愠怒。

每当这个时候，雁子就会默默地把电视声音调大。但这并没有用。因为很快，爸爸和妈妈就会吵起来。在暑假看电视，尤其是在暑假的夜晚，往往都会伴随着父母隐忍的吵闹声。

不过，尽管妈妈在爸爸面前强势如斯，但在奶奶面前，妈妈是不会抱怨的，她只是沉默地干着自己平日里干的事。再怎么讲，奶奶也是个老人家。妈妈教导过我，尊老是传统美德。只是，平时叽叽喳喳如同小麻雀一样的母亲，在奶奶面前半句话都不肯多说，总会让雁子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今年，奶奶照例提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垮着一个大红色的帆布包，上面还绣着一朵镶了金边的牡丹花，从一千多公里外的家乡前来，比迁徙的候鸟还要准时。这大红布包看起来又土又俗，也不知道为何奶奶总喜欢背。

一进门，她便抱住雁子，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堆满了高兴。

“雁子，有没有想奶奶啊？”

“奶奶，你又带了什么好吃的来？”雁子有些尴尬地岔开话题。她不愿说想，也不愿说不想。不论怎么回答，在场的人总有一个会伤心，索性就不回答。

“有萝卜干、地瓜干，还有我晒的咸鱼、腊鸭、腊肠，都是你爱吃的……”奶奶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样，但却从来觉得不厌烦。

虽然她对这些土特产没什么兴趣，但这好歹是奶奶的一份心意。雁子乖巧地点点头，脆生生地说：“谢谢奶奶。”

“雁子，我没记错的话，过了这个暑假，你就要上初中了吧？”奶奶摸摸雁子的头，明显话里有话。

“妈，你这是……？”爸爸的表情有些错愕，仿佛知道什么，但又不敢相信。“你别管，专心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奶奶打断他，又看了雁子妈妈一眼，才略有迟疑地开口道：“我已经把手续办好了。”

“妈！你怎么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雁子爸爸急了，但口吻一点也不强硬。反倒是雁子的妈妈，在奶奶说完后，一言不发地走回卧室，然后“怦”地一声用力把房门摔上。

“在这耍什么脾气，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奶奶看着那扇紧闭的木门，略带心虚地小声嘀咕着，随即她又笑着对雁子说：“雁子，以后你就能回家乡和奶奶一起住了，不开心啊？”

“那爸爸妈妈呢？”

“雁子和奶奶住一起，不好吗？”

她眨巴眨巴眼睛，心底忽然升起一阵慌乱。她张张嘴，想说不好，但是看着奶奶那两颗浑浊却不容反驳的眼珠，“不好”两个字被生生咽了下去。

她恍惚能够理解妈妈在奶奶面前为何一言不发了。

两个月的暑假，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雁子总觉得，这个暑假要比以往还快上一些。

八月中旬，雁子跟着奶奶，踏上了归乡的绿皮火车。爸爸说，他们十二年前来这座城市，也是坐着这样的绿皮火车，也不知道跟自己坐的是不是同一辆。雁子坐在火车硬卧的床上，看着小窗户外面站台上的爸妈，鼻子有点发酸。

“雁子，你不高兴吗？”与雁子不同，奶奶看上去是欢喜得很，“现在舍不得，等回去了你就高兴喽。外面自然比不上家乡好。”在奶奶心里，再没有比家乡要好的地方了。

雁子轻轻地嗯了一声，没有说话，脑子里不知为什么反反复复地回放着昨天母亲和父亲争吵时说的那句：“雁子不只是她的孙女，她还是我的女儿！”雁子想着想着，火车走着走着，从正午到黄昏，从黄昏到月出。雁子再也忍不住，悄无声息地哭了起来。

“哭什么哭，你就这么想着你妈？”奶奶此刻才露出不悦，骂骂咧咧地说：“都说女儿亲爹，你怎么这么亲你妈呢？你妈有什么好的，懒不说，花钱还大手大脚，要放在我们那个年代，哪里嫁得出去？也不知道你爹看上她哪里了……”

“你可不要学你妈。”末了，奶奶又加上一句。

话音刚落，火车上的灯便熄灭了——火车硬卧十点半熄灯。奶奶脱了鞋袜，躺到床上来。雁子就睡在床的里侧，奶奶挤得她紧紧贴着墙壁。

“这不是睡得下嘛，还好没听你妈的买两

张硬卧。”在睡觉之前，奶奶又嘀咕了一句，便安安心心地睡了，留下雁子，瘦瘦小小地被挤在一边，怎么也睡不着。

隔日，火车便到站了。

雁子的家乡是一个十八线小城市，火车停留时间不长，因此奶奶早早便叫她起来。

下了火车，她一边跟着奶奶，一边四处张望着，打量这个新鲜的城市。也就一黑一白的功夫，自己居然已经身处在和昨天相隔千里的地方了，这让雁子觉得很是不真实。

不过，这就是奶奶眼里千好万好的家乡吗？雁子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奶奶家，以后也是自己家了，只觉得怪陌生的。虽说是在这里出生，但自己对这里却毫无印象。

这座城市，怎么说呢，不能说破，也算不上崭新，路上连车都不多几辆。如果说，她之前居住的城市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学校，那这个城市，毫无疑问便是一所暮色深深的养老所。

“到了。”下了公交，奶奶领着雁子在小巷子里穿来绕去。约莫走了十几分钟，才在一所爬满了青苔的老房子停下。

从今天起，这就是自己的家了啊。雁子看着这老房子，怔怔地想。

奶奶给雁子找的这个学校是当地最好的初中，军事化管理，要求学生都住校。住校好啊，雁子也不是很乐意和奶奶独处。住校好啊。

日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着。作为一个长相普通、成绩中上且毫无特长的姑娘，雁子的青春里并没有什么值得说道的事。硬要说的话，也就只有初三时，她的一个异性好友突如其来的告白，算得上是她的青春里比较浓厚的一笔。

雁子也不知道自己对这个男孩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由习惯养成的好感与喜欢而产生的好感之间没有太明确的界限，因此两人也依旧这么模模糊糊地一起走了。经常一起走的男女，总会被班上同学说是一对。

“雁子，你说，我们以后还会不会继续在一起？”那个男孩和雁子不同。他是认真地知道自己对雁子的喜欢，而青春期男孩所都有的一个特质，就是爱幻想。

“我不知道。”

“那我们以后会不会结婚？”

结婚吗……雁子想了想。结婚，就意味着要叫另一个根本不熟的长辈为妈妈，意味着即使是

在自己家也不能完全放松，意味着会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争吵不休。更重要的是，即使自己做得再好，在长辈眼中自己依旧又懒又馋……

“不会。”想到这，雁子斩钉截铁地吐出了两个字。不是针对这个男孩——虽然自己也确实没有那么喜欢他。她只是打心眼里认为，自己不会结婚。

男孩没有说话，故作轻松地耸了耸肩。但雁子分明看见他的眼睛暗了一下。

也就是从这天起，两人渐渐疏远了。

没有人说分手，就如同当初也没有人说过非要在一起，一切就这么发生了，自然而然。

对此，雁子也并不觉得有多难过。

在雁子高二这年，她的爸妈也回家乡了。

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从头再来。雁子的双亲在外打拼了这么多年，却依旧没闯出什么名堂，而家里的亲戚却一个个乘着地区政策的东风富裕起来。雁子爸爸顶不住奶奶的一顿说教，带着雁子妈妈以失败者的身份回到了老房子里。

“早跟你们说了让你们回来，我是为你们好，你们偏就不信！”奶奶骂骂咧咧的，恨铁不成钢的话语中，却隐隐带着一股“我就说我是对的”的得意。

对于父母的归来，雁子很是开心，但又害怕父母会一如以前那样，因为奶奶而争吵起来。

不过好在，老房子以前为了方便租给别人，每一层都装修得如同公寓一般，有客厅、厨房和卫生间。雁子爸妈就住在老房子的三楼，而奶奶则和雁子住在二楼。一个楼层的距离不大，但是却能够互不干扰，严严实实地隔绝了妈妈和奶奶的明争暗斗。

这约莫三十厘米厚的地板，居然成了家庭和谐的最强守卫。只是，每次吃完晚饭，雁子和父母外出逛街时，仍然不可避免要经过二楼。每当奶奶看见他们三人出门，总会刺耳地说一句：“天天出去天天出去。想想你们为什么挣不到钱，就是因为你们总是大手大脚。”

而等到他们从外面回来后，奶奶也常常会把爸爸叫下二楼“促膝长谈”。什么“我从小养你到大，你不是那么爱玩的人，肯定是你媳妇又求着出去玩的对不对？”“当初看她面相我就觉得她不是个会持家的人，你看看，被我说中了吧？”“一天天的，钱没挣到多少，花

倒是挺快。”这些话，住在奶奶隔壁房间的雁子听得耳朵都要起茧了。

可是奶奶说得明明不对。不是妈妈求着出去玩，而是雁子自己求着出去玩；虽然每次出去都会买一大堆东西，但其中有一半都是给奶奶买的；妈妈虽然看起来嘻嘻哈哈，但是每天都有记账，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

雁子原本就不太喜欢奶奶，如今长大了，就更是不喜欢了。

“妈妈，为什么你不和奶奶好好沟通一下？”一天，雁子和妈妈两人出去散步。她想了很久，终于问了出来。

小时候，她不懂为什么妈妈和奶奶之间有这么大的鸿沟，而现在，她觉得这鸿沟不是无法跨越的。若是两个人好好沟通，解除奶奶对妈妈的误会，也许就……

“没有必要。”妈妈语气淡淡的，无喜无悲，“就现在这样互不打扰地生活就好，我也懒得再花费口舌，去撕掉她对我十几年来刻板印象。雁子，等你以后长大结婚了，就会明白了。”是这样吗？可是雁子不想结婚，也不想明白。

雁子本以为，这种妈妈和奶奶之间的斗争会一直持续下去，然而让她意外的是，在她上大学的第二年，这斗争便戛然而止了。

这年冬天，奶奶因病去世。雁子接到消息，从学校匆匆赶回家时，奶奶已经入了棺。

她是在前一天晚上走的。睡着时突发的脑溢血，来势汹汹，连救护车都没有等到，便咽了气。

爸爸请来了道士给奶奶做法。雁子看着那个原本西装革履，穿着小皮鞋的人，只进了一会卫生间，便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模有样的道长。他拿着一个两头都点燃的火把，不停地跳啊唱啊，像是在正儿八经地耍着杂技。而他的助手，则在一旁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把早就准备好的纸符扔到火堆里，任由它烧成灰烬。

亲戚们也都来了，装模作样地齐齐跪在堂前。雁子从没觉得，一楼用来停放摩托车的厅堂，居然这么小这么小，小到连一点悲伤也容不下。

说实话，雁子也不知道现在自己是什么心情。虽然和奶奶一起住了六年，但雁子仍然和她并不亲近。在雁子心里，那个最好最好的女性，永远是妈妈。她甚至觉得，奶奶走了之

后，便再没有人会在暗地里数落自己的妈妈，似乎也……

她简直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雁子，去磕头。”雁子妈妈见她想得出了神，悄悄在她耳边说了一句。

“妈妈，你讨厌奶奶吗？”雁子轻声问了出来。

“你这孩子！”妈妈也被她吓了一跳，嘴唇动了动，只是说：“快上去磕头，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雁子挠挠头，正准备起身上前时，妈妈轻轻地叹了口气：“谁知道呢，日子不还是一样要过下去。”原来是这样的吗？

雁子懵懵懂懂地走上前跪下，板正地磕了三个响头，比刚才上前吊唁的人磕得都要用力。那原本烧纸的道士瞄了她一眼，嘴里喃喃道：“心诚则灵心诚则灵，你奶奶会保佑你学业有成，嫁个好人家的……”原来，是这样的啊。

正如雁子所想的那样，奶奶去世之后，妈妈总算活得放开了些，像之前他们在大城市里生活时一样，想出去逛便出去逛，再也不用担心回来得晚会惹人厌。

只是，有时候雁子会想，妈妈和奶奶之间的关系，真的有这么不可调和吗？一定要一方离开，才会终止？别人家也是如此吗？但就如同妈妈说的，不管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日子还不是一样要过下去。

雁子把奶奶留下的那个大红色牡丹花帆布包叠好，和其他所有的遗物一起，封存在箱子里。她走出奶奶的房间，轻轻关上门。

窗外雪花纷纷飘落，那些走过的脚印都掩埋了……

林高评语：

本小说揭示的是人性普遍存在的症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难以调适的成见而产生生活的缺憾——不仅婆媳，即使婆孙也存在这样的成见。作者用一个成长中的少女来看故事的发生和结果，无形中隐喻着另一层意思：从小就要明白这个很难处理的“人性难题”。插叙一段雁子情窦初开而没有结果的“恋爱”，是让她亲历其境，领会这番道理。妈妈与奶奶之间的不愉快是靠一方死了而结束的。“葬”这个题目定得很好，它引申出来的意思是：“奶奶”变成了喻体，那个本体——“人性难题”——没有解决。



一片冰心在玉壶

作者·陈芷婷

“姑婆，姑婆，为什么你们要当自梳女啊？”

看着周围坐着的孩子们眼里闪烁着无尽的好奇，我娓娓道出了我们的故事：“别急，这个故事很久远，说来话长……”

“小瑛，你想去南洋打工吗？”

“现在广东蚕丝业不景气，许多人都送自家的女儿去南洋和香港打工。听说酬劳相当不错，你看呢？”母亲问得小心翼翼。

我默不作声，心里暗暗思量着。

“自从你父亲去年过世之后，家里就有些入不敷出。你看家里六个兄弟姐妹，就属你最大；最小的弟弟黄振明年也要上学了，家里开销这么大……”母亲看我无动于衷的样子，继续念叨劝说着。

“阿母，不用说了。我愿意，我要当自梳女。”我坚定地说。

“你确定？真的想好了吗？”母亲试探性地问。

“是的，阿母。”

“我已经去问过了，‘水客’跟我要两百银

元，这么贵！”母亲抚着胸口，显然是气得不轻。

“阿母不要生气了，我会在新加坡好好做工！每个月会把钱寄回来！”我连忙出声安慰着。

“那明天我就请师傅来为你自梳。”

“自梳”仪式先由村里人选择吉日吉时，良辰一到，便请村里德高望重的婶母主持祭祖。然后举行“梳髻”仪式，自梳女将自己长发及腰的辫子挽成发髻，表示永不嫁人。当日还要邀请亲朋好友到场，摆上几桌酒席，以示公众。

自梳女一旦辫子梳起就不得反悔，日后如有不轨行为，就会为乡亲所不容，遭到酷刑毒打，被浸猪笼。就算老死，自梳女也不能死在娘家，父母不得收尸葬殓，由自梳女们用草席包裹，抬到村外挖坑埋葬；若村中无自梳女，便将尸体抛入河中随水流去。

一想到这些不成文的条规，我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我已经做好下半辈子老无所依、孤苦伶仃的心理准备了。

母亲在为我梳发的时候有些艳羡地说：“有些女子只买了一只鸡、一把尺和一把剪刀，静对

神灵默默发誓终身不嫁，这就算是完成自梳了。你这算隆重了呢！”

我望着镜中的自己，脸上都是平静。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这一年，我十六岁。

家人将我送到顺德最大的渡口时，那里已经停泊着一艘不小的船。许多女子眼里噙着泪珠，依依不舍地和家人道别。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一去何时才能返乡。船家催促我们赶快上船，我对着阿母挥挥手，告诉他们我会写信回来的。我又拍了拍黄振的头，告诉他要好好学习。他明亮的黑漆漆的眸子转也不转地盯着我：“阿姐，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很快的，等你长到我这么高的时候我就会回来了。”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他现在的高度只到我的胸口，刚好可以抱到我的腰。“阿姐，我也很快就会长大长高的！”

我笑了笑：“好呀，你要吃多一点，乖乖听阿爸阿妈的话，不要调皮听到没有？”

他如同一只被驯服的小兽一样点了点头，喉咙里有些呜咽声。清晨雾水多湿气重，浸湿了我的眼眶。我不敢再看他们，胡乱地挥了挥手就头也不回地上船了。

上了船才发现住在村尾的黄芳也去南洋当佣人。我们是最好的玩伴，早上一起上学堂，下午聚在一起玩耍，没想到这次也一样的志同道合。在异国他乡我总算不会是茕子一身了，有个伴就有个照应。

小芳告诉我，她没有自梳，只是答应家里愿意漂洋过海到南洋打工，每月将酬劳寄回家里；若是能在这一带定居下来，也是好的。

小芳还有机会返乡，可是我……我也许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我笑了笑，没有继续这个沉重话题，转头看向包围着我们的深蓝色水体。

第一次看见大海的我们都被这一望无际的蔚蓝色惊呆了。可是航海旅程遥遥无期，每天都有体弱的女子因为缺水 and 新鲜蔬菜而得了坏血病去世。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有船夫将她们腐烂的尸体丢进海里，我们的心跳频率随着那一声声的“嘭——”上下颤抖。我和黄芳看得胆战心惊，在一旁紧紧相

拥，唯恐有一天自己也会落到这样的下场。

船在海上航行了几个月，包括我和黄芳在内为数不多的自梳女在颠簸中抵达了新加坡。当时在南洋的广东女子很多，其中有“三水婆”在建筑工地上干活；还有在船上戴蓝头巾的工人；最后就是最普遍的家庭女佣。

我和黄芳被一同分配到陈先生家中里当妈姐。陈先生拥有一座很大的庄园和别墅，平时他出国谈生意，四处奔走，家里只有太太、少爷和小姐，我们的工作也算轻松。托陈先生的福，我们在新加坡每个月至少可以挣五块钱。这笔丰厚的薪资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一楼最角落的房间是佣人房，六个人一间房，分上下铺；二楼是小姐和少爷的房间；三楼是老爷太太的主人房，平时除了打扫卫生不要多去那里。你们的职责就是打扫卫生，洗衣服，洗碗碟这些简单的活。做得好的自然可以留下，做事不用心的月底就可以走人了。”管家是一位叫陈莉的妈姐，比我们早几年就到新加坡来谋生了。在带领我们熟悉陈家庄园的时候，她叮嘱我们：“佣人和主人是不能平等对话的，和主人说话要用敬语。”

末了，她又补上一句：“自梳女最不缺的就是孤寂。既然你们决定了离乡背井，就要早日习惯独来独往。”

“莉姐，你出来这么久，有没有回过家？”我问。

“没有，我也没想过能回去。”

她的神情里有抹不去的忧伤。我知道她是想家了，我们都何尝不是呢？

刚开始写信回家的次数很频繁，到后来觉得太麻烦杂货店的伙计，于是写信告诉家人自己在新加坡一切安好，受到会馆的照顾和恩惠，无须担心。写信的次数少了，但寄回家的钱却是有增无减。我们平时没有什么积蓄，住在主人家里也无需为生活用品担忧，也还过得去。

过了几个月，有人看到园丁的儿子阿满在花园里追求我。不论阿满提出的条件有多么诱人，我都不为所动，轻轻地对他摇了摇头。夜里，佣人房里黄芳问我，被追求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翻了个身：“在这如花似玉的年纪，谁抵

挡得住爱情的火花？哪个女子不想和自己爱的人白头偕老？可是我已经答应父母，又在神明前发过誓，终身不嫁。”

“我觉得女人也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不需要有婚姻作为下半辈子的保障。”我说。“出来见了世面才知道，家里的那套思想太落伍太保守了。‘三水婆’和我们一样，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挣一口饭吃，我们要证明我们不是软弱的人，不需要在男人的庇护下苟延残喘。”

“为了家庭圆满，为了家人能过上好日子，总要有人做出点牺牲。阿爸已经去世了，我应该扛起照顾整个家的责任。”

小芳想不明白，却能听到我整夜都在翻来覆去地叹息。

偶尔一个月里，先生会允许我们休息一两天，让我们可以出去走走。我们经常去“老人间口路”的粤海清庙拜妈祖。跪在庙堂里闭上眼睛，黑暗中一闪而过的是家人清晰的脸庞，还有弟弟黄振在耳边清脆的声音。

有一次拜妈祖回去后，佣人间闲聊时不知谁说漏了嘴，月娥姐许的愿是早日嫁人。当时我们是同一批进来当佣人的。这话可不能乱说，月娥姐的发髻每次是梳的最一丝不苟的。

过了没多久，就传出了她和阿满结婚的消息。熬过芳华易，耐住寂寞难。

“小芳，我想回家。我想念村门口的那棵梧桐树，我们小时候一直爬上爬下闹着玩的那棵树。”我轻声地说。过了三年，这是我第一次对她说我想家了。

回家。多么遥远的字眼。为了家庭，为了家人能过上更好的日子，独自漂洋过海打工。几十年来，我们也听说了不少妈姐因总是带着敷衍了事的态度，服侍主人家不够尽心尽力，所以被遣送回国的例子。

“哎，你听说那个谁又被送回中国了吗？”

“又是一个？这个月第几个被送回去了啊？”

“真是造孽啊！”

“就是！好不容易出来了又回去了，不知道在村里要怎么被人诟病！”

“啧啧，回去就只有‘守墓清’（自梳女找一死人出嫁，做死者名义上的妻子，以便将来可以老死夫家。自梳女要付给婆家一笔钱来“买

门口”。当自梳女来婆家认作媳妇时，婆家先把门关上，自梳女要“拍门”，阿婆在屋内提出种种难堪的问话：“我家清苦，你能守吗？”等等，自梳女必须回答得阿婆称心后才开门，自梳女入了门就算被接纳为这家的媳妇，以后，必须在经济上贡纳给婆家。）的份了！”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已经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聊天内容了。一提起那些已经走了的姐妹，我们对她们只剩下惋惜和可怜。

可是，回家，意味着前功尽弃。

“我父母写信叫我不回去，国内现在动乱着呢，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打仗。”黄芳说。

“再等等吧。”我敷衍地说道：“也许我们很快就能回家见上家人一面了。”

上铺没有再传来声响。在我迷迷糊糊快入睡时，黄芳翻了个身，嘀咕了一句：“总觉得我们回不去似的。”

“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有尽头。”

日复一日，我们在陈家做事。不时地会收到来自家乡的信，内容不乏是描述家乡变化真大、家里添置了新的物件云云，然后要求我们继续寄钱回去。我们在空闲时候就到牛车水的华人杂货店求伙计为我们写信回复，给家里报平安，将辛苦积攒的积蓄捎回家里补贴家用。

收到信的那天，我从枕头底下掏出饼干盒，打开盖子翻来覆去地数里面的钱。没收到信的时候也会数数，多数是晚上临睡前。这是最好的安眠药了，数完了心里觉得比较踏实。

渐渐地，我们都很有默契地对回家的事情缄口不提。

光阴荏苒，远在他乡的我们迎来了新时期的到来。我们听说了改革开放的消息，请求雇主让我们返乡。我们老了，对他们来说是个累赘，帮不上什么忙。陈家的再三挽留也没有撼动我们归心似箭的决心。陈家为我们打点好一切，订了船票送我们回国。

这次回去的却只有我一人。早已爬满皱纹的手拎起当年漂洋过海来时带的布包，这些年放在橱柜里不用已经充满了潮湿气味。我拍了拍上面的灰尘，它的花纹仿佛和当年一样崭新且鲜艳。

我收拾好自己的细软，连同黄芳的东西和一个小木盒一起装进了包里。

忙活了大半辈子，我的两鬓已经被岁月染成了雪花，手也变得更加粗糙了，关节处都是辛勤工作后长的硬生生的证据。我抓紧了布包，登上了回乡的船。

政府在均安镇沙头村外的一个偏僻角落划了一块地为我们建了一个栖息之地，取名为“冰玉堂”，取自“一片冰心在玉壶”，为出淤泥而不染之意。

有一天一群孩子来到了这里。时代不同了，他们从新加坡坐飞机过来的。他们带来了许多咖啡糖、咖啡粉、榴莲糖等等，都是当年我们爱吃的东西。

我算是里面腿脚尚好的了，就由我带着孩子们参观。

推开老式的铁门，映入眼帘的是狭小的庭院，整齐别致。花园里有一棵树外形奇特，树高数十米，笔直的树干直刺苍穹，到树冠才有一簇枝叶。“这是桫欏树，据说以前有两棵，是我们中有人亲手种的，表示一心一意不嫁人，像是双生花一样。不久后，其中一棵树不知怎地某天夜里忽地倒了，或许是因为姐妹们中有人‘变心’的缘故吧。”

步入堂子的深处，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挂满“塔香”。“塔香”的形状如同蚊香，一支“塔香”的直径约为一米长，一支香可以烧一个月。点燃的塔香带着众人对亲人和去世的姐妹最虔诚的祝福和对美好未来的期许冉冉升起，在晚秋的天气里凭空增添了许多悲凉。

木匾上密麻地写满该村自梳女名字，每去世一位就涂黑一个，现在只剩下十几位了。按照旧俗，自梳女不能死在村里。所以冰玉堂建在村外，离沙头村还有很远的一段路。“楼上你们看到的那几个玻璃柜子，是预备给去世的自梳女们的。如果没有拼命积点血汗钱与其他姐妹买下这块地方，真是临死时连停尸的地方都没有。”

自梳女都有牌位，死者的名字写在黑纸上，生者的名字写在白纸上。堂内还立着一块自梳女的集体牌位，每个人都将名字刻在上面，如果还在世的，就贴一张写着“长生位”的红纸，一旦过世就会撕下来。

长生不过是对自己这辈子经历了无数坎坷后渴望安稳的祝愿罢了。

依然活着的人守着这些牌位，不知何时会轮到我們被守护。

我静静地看着这帮孩子，他们唧唧喳喳的，给平时冷冰冰的堂子添了许多生气。

我从一个橱柜里翻出珍藏的旧照片。泛黄的纸张上印着的是我当年的样子，干净利索，精神抖擞，宽松长裤，黑发成髻。

在一阵唏嘘声后，有人终于问出了别在大家心底的那个问题。

“姑婆，为什么你们要成为自梳女啊？”

“唉，我们看到一些姐妹出嫁之后在婆家受气，地位低微。于是我们不愿受婚姻的束缚，自愿成为自梳女。”

另一位姑婆也附和道：“孩子，绑住我们的不是贫穷，不是夫家，而是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思想。现在改革开放了，人们的思想也渐渐开放。女人也有了地位。”

“那当你们老了，怎么又想到要回到中国来呢？”孩子问。

“当你在异国他乡独自漂泊，如同一叶扁舟在猛烈暴风雨中被惊涛骇浪推向未知的地方，那时你就会想念家乡的安稳、平静，想念村后的那条小河，眷恋夏天清澈的水流温柔地拂过你的脚踝的感觉。”

“我们挣了半辈子的积蓄足以让我们安享暮年，还可以补贴村子里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我们只是要回家，回家就好。家乡还是那个我们记忆里原本的样子：村门口的那颗参天的梧桐树、村后的那条清澈的小溪、村里那条上学路上必经的小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

终于轮到我了。眼皮是那么沉重，耳边响起了母亲儿时哄我入睡时的温柔：“睡吧……睡吧……”

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是当年在码头与家人分别的场景。战乱时期，他们早已搬离了这个村，我也只能通过信件对他们的动向了解一二，后来也就渐渐不知去向了。可能是搬到大城市去了吧。不知他们是否安好？有没有躲过那些不长眼的枪弹？

想到这里，我慢慢地阖上了眼睛。

冰肌不染红尘垢，自挽青丝度一生。

(2020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以《双城恋》



文图·怀鹰

解读孙宽



双城的意涵指向

城，不仅仅是指硬体建筑，包括基本设施，人工化了的自然景观，细腻的部分包括文化建设，历史演变以及人文环境的氛围。顾名思义，所谓“双城”，北京与狮城。北京是作者的祖籍，是来处；狮城是作者旅居26年的地方，是归属。北京是家乡，狮城是异乡。家乡与异乡之间处于怎样的状态，靠什么维系两地情？

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双城将她的人生联系起来，她在几十年的往复中，围绕它，追赶它，超越它。双城也是她与自己对话，与他人，扩而大之，世界上万事万物，乃至宇宙星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更是新加坡与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宇宙万物之间微妙的内在关联，或它们自成体系的某种意义。这是虚设的“城”，属于精神领域的城。

以《双城恋》为例，我们来考察一下。把两个有代表意义的“城”并列在一起，需要大手笔，其中有油画的粗犷，更要有工笔画的细腻，浮光掠影式的素描，很难体现在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名、街名、小食，甚至地标等的精华和味道。这首诗像这本诗集一样，并非地理导览，带我们在大街小巷溜达，而是通过对一些景观和生活片段的描写，重彩浓墨地展现两座“城”在作

者心里的位置。

“‘砰砰’蹦跳的北京是爱情，‘咚咚’舞蹈的新加坡是婚姻；京腔的炸酱面，罗蒂布拉达咖喱是我的日子和诗”……这些都说明两座“城”都是作者割舍不了的感情，新加坡更是感情的进一步升华。这两种情感互相激励和渗透，她寻觅到了自己的灵魂之家。“刚刚推开北京的窗/又下起了新加坡的雨”，它们之间的关系已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无论是北京，还是新加坡，不是作为一座城市的标志而存在，而是植根于一种异常清晰的感情底下，这是《双城恋》的基调。在作者的思维里，两座城，只有地域上之差别，而“恋”却像一条脐带相连。

对一个远离家乡故土的游子来说（虽然孙宽在此地已经生活了26年，并已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困扰她的并非来自异地生活的难度，一个能在异乡扎根的人，都有很强的适应性及旺盛的生命力，而是这挥之不去的“乡愁”，扑朔迷离。“乡愁”是一个充满诗意而永恒的题材，既抽象又具体，有时又玄幻迷离得令人难以捉摸。孙宽的乡愁不是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直白陈述，不是王湾（约693年-约751年，唐代诗人）“乡书何处还？归雁洛阳边”那般殷切，无奈。也不像余光中在1972年写的《乡愁》，借

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孙宽把自己形容为一个异族，“我来自云，独自漫游”，换句话说，游子的身份等同异族，尤其是她漫游世界各地，这种感觉来得异常强烈，这是一种不断变换的生活和情思；她把自己放在“被禁锢的异类”，作为一个东方女子，又是回族，她一定面临过各种挑战。

乡思“抑郁成散不去的雨丝，凝聚，缠绵，再凝聚”，周边一切的陌生与不平衡，世界之间的裂缝，作者都尝试“青春发丝穿线”去缝合，异族的婚姻被她当成“弥补一切伤痛的良药”。但是平衡会“在制造的和谐中打破”，就像赤道的雨“一边是阳光灿烂，一片是瓢泼涤洗”这种心造的幻境加深了作者的“漂泊”，虽然“孤独而快乐，真实而虚无”。这是扎实的漂泊，也是虚幻的漂泊，而这，无异构成孙宽心底最深沉、最难诠释的“乡愁”。

有如电影镜头里的过场简介，都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本位存在。又比如《故宫没故事》“没有故事”是反衬、反观或反讽，正如作者所说的“每场雪，每条雨丝都有故事，你没有”。记忆是如何中断的？或者为何竟然如此单薄？也许留存在作者心里的仅剩“火种的灰烬”，它以“一种移植，某种废弃远离/和我一样，恒久的石头不再当年/岁月的苔藓滋长，躲避着阳光”。

相比之下，狮城在作者心里所占的比重远超过家乡。《双溪布洛湿地》、《榜鹅的海》、《狮城与我》、《新加坡的河》、《狮城，有维度的严苛》、《中峇鲁儿童乐园的秋千》、《我是如此爱着你》、《纱丽的节日》、《我的小时工是位菲律宾女佣》、《落地生根》、《联合早报的印刷车间》、《一切近的都远去了》、《边界》、《每天，最后一朵花的蕊》等，不仅涉及了新加坡的景观和民俗，还如同新加坡人一样呼吸，已经进入本土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要真正融入狮城的精神内涵，也许要经历几代人，这不是哪一个诗人能够超越的局限。

风格和语言的塑造

对一个诗人来说，风格是一生追求的目标；风格的塑造有助于提升语言特点和表达技巧。

李白的诗风格是豪迈奔放，想象丰富，意境奇妙，浪漫；杜甫是现实主义大师，沉郁顿挫，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孙宽虽然在狮城生活了20多年，但她的文学根底植根于中国，写出来的诗有很浓烈的中国风格。长短诗都有，所谓长，指的是超过20行以上的诗，最长的一首《狮城与我》，达到30行，诗一长，情绪和节奏较难控制。

孙宽的诗不能冠之以婉约派，浪漫派或什么文学流派。其实，她的诗还未定型，还在探索之中，还未建立自己个人特殊的风格。平心而论，孙宽驾驭文字的功力来自于她的散文，也许是受了散文的影响，孙宽倾向于长句子，读起来比较费力。同时，她也把散文的结构带进诗歌，以致于诗本身的结构不那么严谨，诗思的渗透也就比较薄弱，节奏感不够鲜明。作者有很强的抒情天分，这可以从一些诗的形容词看出来。

不过，我们偶尔会看到一些很奇怪，蕴含某种禅机的句子。如：

“顺手掀断一根黄瓜，嚼出它绿色的血液”
——《脱落的甜》

“我一睡去，身体就会大块大块结冰”
——《河流》

“我企图引诱自己，把自己堕落成漩涡”
——《我假装是一条鱼》

“尘埃死去时，流水为它送葬”
——《万物的婚姻》

“我把耳朵贴在上面听盲鱼的悄悄话”
——《盲鱼和古扬子海》

“我把秋千荡去给星空，月亮和秋天”
——《中峇鲁儿童乐园的秋千》

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出孙宽对文字的敏感度和构思的奇巧。相比之下，孙宽的短诗所占的分量略少，所谓短诗是指十行以内的诗，计有《梦》、《欠》、《自画像》、《邂逅诗》、《聆听》、《小饭桌》、《我的眼睛开始下雪》、《我种过一段春意》、《榜鹅的海》、《把黑夜写出闪亮的星星》、《我们从未看见大海》、《盲鱼和古扬子海》、《我和你如此相似》、《聚散》、《我的心下着雪》、《海域》、《久违的山楂片》、《芭蕾舞》、《失眠》、《猫眼》、《谜语》、《细



节》、《吊兰》、《思念》、《枯萎》、《困倦》、《亲人》、《麦穗》、《诗人》、《立冬》、《时间》等共31首。我想谈谈《我的眼睛开始下雪》这首：

落雨窗前，时密时疏，不知何时来去
我细数它落下溅起的浪花，无时无响

我不记得糖葫芦是酸的，甚至它的甜，不过
有一种伴随它的冷，渗透了我的骨髓，我的心

系不上冰鞋的带子，伸不出手，屏吸狂奔
没有知觉的冷，今天却这样固执地暖着我

我插在你怀里的小手，慢慢恢复了血色
你的微笑冒着热气，而我的眼睛却开始下雪

特别挑出这首诗来谈，首先是题目吸引了我。《我的眼睛开始下雪》，这样的题目不落俗套，我会很想知道，眼睛为什么会下雪，下的是什么雪，雪意味着什么？其实，整首诗并没有直接写雪，直到最后才出现“你的微笑冒着热气，而我的眼睛却开始下雪”，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雪隐藏得很深。我们且看看雪为何会下在眼睛？

“落雨窗前，时密时疏，不知何时来去/我细数它落下溅起的浪花，无时无响”。天气转换，窗前下起了雨（雪融化了成雨），时密时疏，没有

始终，大概下了好长一段时间。如此雨景，如此情怀，确实令人惆怅。而“我”怅望着雨“落下溅起的浪花”，也过了一段时间。一个人，静静的站在窗前看雨，而雨却没有间断，也不理会看雨的人的心情。第一节诗便已营造出一种天地茫茫独徘徊的心境。

“我不记得糖葫芦是酸的，甚至它的甜，不过有一种伴随它的冷，渗透了我的骨髓，我的心”。作者独倚窗前想的是什么？这一场雨勾起了她的思念，但她不说思念如何如何，记忆多深多深，而只说“我不记得糖葫芦是酸的，甚至它的甜”，从味道联想故乡特有的小食，满溢浓浓的乡味，竟然“酸”与“甜”都久远得忘记了。然而，这糖葫芦却“有一种伴随它的冷”，而且“渗透了我的骨髓，我的心”，回忆引来的是这般凄冷，“不记得”是为突出某种记忆的深刻，尤其是在这样的雨夜里，有些记忆竟然像生命一样沉重，哪里只是一阙冷冷的小令？

这是不是铺天盖地的蚀骨难耐的“乡愁”呢？“系不上冰鞋的带子，伸不出手，屏吸狂奔/没有知觉的冷，今天却这样固执地暖着我”。滑冰时的一片冷，冷得连冰鞋带子都系不上，今天回忆起来，不只带来一丝“暖意”，而且还“固执地暖着我”。这是一种清澈的感觉，无关天气，纯粹是一种内心情感的涌动。

“我插在你怀里的小手，慢慢恢复了血色/你的微笑冒着热气，而我的眼睛却开始下雪”。故乡，那个寒冷的地方，曾经有一个温暖的怀抱，把她冻得失去血色的小手放进自己怀里暖着。“小手慢慢恢复了血色”，因为“你的微笑冒着热气”，然而今天，在赤道这样温暖的地方，可“我的眼睛却开始下雪”，这样的“雪”比流下的泪，更令人心疼。

这首小诗写得优雅，层层推进，与我们的呼吸节奏很搭配，从而形成一种类似波浪起伏的态势，是一首很有质感的小诗。

孙宽的诗如果能朝这个方向挖掘，相信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在诗坛上另辟蹊径。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学奖、金笔奖、冰心文学奖评委）

《源》杂志

优秀文学作品奖 (2021)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21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散文。以下是“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体裁：散文（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4000左右。

投稿：即日起至2021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

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S\$2000元及获奖证书。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 来稿须为有本土元素的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
ruihong@sfcca.sg
并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欢迎通过电邮将您的建议和意见反馈给我们



杜亚蜡染作品《海边野餐》(1968)